

亞達米陽著  
康敏夫訳



# 史 的 唯 物 論

著 陽 米 達 亞 · 聯 蘇

譯 夫 敏 康

1937

三四  
侯  
書  
會  
所  
書  
一九四〇年

神 州 國 光 社 總 經 售

---

# 史 的 唯 物 論

---

每 冊 實 價 三 角

外 埠 酌 加 寄 費

著 者  
蘇 聯 · 亞 達 米 陽

譯 者  
康 敏 夫

發 行 者  
南 國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神 州 國 光 社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七 八 號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廿 六 年 三 月 初 版

---

# 史的唯物論目次

日譯者序……………一

譯後記……………一

第一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底唯物史觀要素……………一

一 唯物史觀發見之意義……………一

二 亞里士多德底唯物史觀的要素……………二

三 十七八世紀布爾喬亞思想家之歷史觀的根本缺陷……………五

四 十七八世紀之史的觀念論的進步性……………一〇

五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唯物史觀要素……………一四

六 王政復古時代之歷史家們和英國古典經濟學派……………一六

七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一八

八 費爾巴哈	二二
--------	----

## 第二章 形成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唯物史觀問題的見解……………二二

一 史的唯物論的形成過程	二二
--------------	----

二 唯物史觀的誕生	二五
-----------	----

## 第三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三三

一 辯證法的唯物論與唯物史觀之內在的聯結	三三
----------------------	----

二 唯物史觀最初的根本問題	三六
---------------	----

三 社會經濟的構成態概念	三九
--------------	----

## 第四章 社會的合法則性問題……………四三

一 社會的法則和自然的法則	四三
---------------	----

二 社會法則的特質	四五
-----------	----

三 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五二

第五章 當作社會科學與實踐的行動方法的史的唯物論……………六一

一 史的唯物論與其他社會科學……………六一

二 史的唯物論與歷史之關係……………六三

三 當作實踐的行動之方法看的史的唯物論……………六七

第六章 構成態、生產樣式、制度……………七三

一 社會的經濟構成態底規定……………七三

二 生產樣式……………七五

三 原始共產的構成態……………八一

四 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八五

五 封建的構成態……………八八

六 資本主義的構成態……………九〇

七 社會主義的構成態·····	九二
八 構成態和制度·····	九五

### 第七章 社會發展的理論····· 九九

一 世界史之統一和生產力·····	九九
二 技術和生產力·····	101
三 當作生產力發展形式看的生產關係·····	105
四 當作社會發展的起動力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矛盾·····	111
五 當作敵對構成態的發展及交代法則看的階級鬥爭·····	116
六 上部構造的能動性和相對的獨立性·····	125

### 第八章 史的唯物論的最近發展····· 133

一 和布爾喬亞社會學的鬥爭·····	133
二 和客觀主義的鬥爭·····	137

三	和主觀主義的鬥爭·····	一三八
四	和少數派、修正主義的鬥爭·····	一四〇
五	和普列哈諾夫的論爭·····	一四四
六	伊里奇階段底史的唯物論的發展·····	一四六
七	史太林階段底史的唯物論的發展·····	一四九



空白页

## 日譯者序

這已經是遠在十五年前的事情了。當我最初接觸到唯物史觀的斷片知識時的欣樂，至今還鮮明地殘留着作爲燃起我前途的希望之學生時代的追憶。

那時候，自己初從文學的觀點來觀察世間的眼光比較擴大一點了，但爲人類生存的真正道路，却無時不在我的腦海中苦惱着。跟着接近文學的思想，我就和現代現實生活離開，而另外幻想出很像蜃樓海市的一個新思想的世界。而且，越是在思想的世界中追求甜密的夢，就我的關心似乎越加離開現實社會了；最後走上禪道，甚至在破曉的時候，還在旅館樓上的禪座拚命地作苦心的修道。在這個時代，作爲觀察世界，觀察社會指針的唯物史觀的知識，對我曾發生了怎樣的影響呢？這簡直是我思想的一大轉變；發見自己在世上生存的意義底欣樂，實在是不能用什麼譬如所能形容的。

1

知識雖是斷片的，但那時我對唯物史觀已有了新鮮的印象。而且深深地感到：發見唯物史觀，就是明顯地反映出人類今後應走的途徑。思想的殿堂崩潰後，目前的世界就顯現

出各不相同的意義，而社會的問題也成爲我的研究中心了；其後，對於史的唯物論的研究，還同時從各事種著作的翻譯；當時，雖然企圖積蓄一點唯物史觀的知識，可是，這個時期，有體系化的唯物史觀的理論，在我的腦海中還是飄飄然擺盪着，我當時爲什麼會來幹這樣不合身份的事情呢？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

現在蘇聯的科學者們，大半是由於教育事業的必要，而將史的唯物論完成爲一個科學的體系，那麼在今日，我們對於學習有系統的唯物論的知識，是比較容易得多了。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和範疇裏頭有着怎麼樣的東西；它有怎樣的內容；由怎樣的順序來配列，這在大體上都決定出來了。而且古典家們的各個解說和命題，也由一定的順序來配列，那對於我們學習史的唯物論的概念和範疇的意味內容，是更加便利了；雖然我們從書本中來學習史的唯物論，是很容易的，但反過來說，却淡薄了我們對史的唯物論的印象；消失了我們從日常淺近之現實生動的運動中，吸取史的唯物論之內容底熱意，而成爲濃厚的圖式化，形式化的傾向；沒有反省自己在知識，經驗和人物方面，較之古典家們惡劣過百倍，而尤常常傾向於古典家們的各個學說公式化；從事解釋來替代真實的批判。

在古典家們的場合，雖然有了對活生生的社會的現實運動底具體的態度，有了從這

現實運動中，發見其後應走的方向底實踐的努力；但在我們今日的場合——最少在我們——也有了蘇聯科學者所體系化了的史的唯物論的知識，有了具備理論形式的體系。在古典家們的場合，雖然是有了從時時刻刻地變化發展的，活生生的人類集團所形成的現實運動在先，其後爲了解釋接近這現實運動的關係和問題，史的唯物論的範疇和概念，才當作一個理論形式而生長出來；但在我們的場合，就是首先在我們的腦海中有了具備史的唯物論的概念和範疇，理論形式；然後才使我們反覆地在存在現實的社會的地方探求史的唯物論的知識。在古典家們的場合，雖然唯物史觀是決定數百萬大衆命運底科學武器；但在我們的場合，却也有言詞的解釋，理論概念的遊戲。理論的進行，要不是好好地嵌入到現實的社會運動，那也只好算是糊亂的空跑罷了。

我們爲什麼需要唯物史觀呢？就是因爲我們想一目了然人類歷史發展的全體；認定現在繼續發展的非常複雜的世界史的具體進行；洞察以世界爲舞台的這個發展的內在的聯結；同時想知道日本通過這世界史的聯結，今後將發展到怎樣的歷史的方向。正爲這樣，我們又要在一切具體性中來研究日本的現實；闡明它制約着歷史底必然的發展方向底階級關係；就是我們自身非站在創造日本歷史的見地不可，但這是一件非常偉大的工

！雖然我們實際地幹着的事情是極渺小的，這也許是希望偉大的小布爾喬亞的空想吧。可是我們既然開口就說唯物史觀，那末，我們就非使它和世界史的現階段打成一片不可的。惟有這樣，才不難成爲一個誠實的史的唯物論者！

唯物史觀雖是人類社會的歷史認識的總和，但其歷史既然是以世界當作一個單位而現在還繼續進步的，就現在還不是從世界史的現階段解除歷史發展的結節點的時期嗎？現在就是應該我們從現世界史的發展及對內在聯結底活動的認識開始，使唯物史觀一步一步地具體地生長起來的時期了。

在唯物史觀創始者們的場合，爲了要使社會主義在科學的基礎上發展，唯物史觀的發見是非常必要的；那末，在我們今日的場合，不就是要使唯物史觀具體化到和我們日常接近的人們的社會結合去嗎？我們無論拿任何一個人來說，這個人總是一定的社會關係的代表者。現在我們在社會上，也是每天結合着一定的社會關係。我們確實是無時無刻不創造着歷史。現在不就是我们從這新的自覺；從現在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底正確認識，使唯物史觀的理解發展到和我們接近的人們發生更密切的關係的時期嗎？唯物史觀也不外是從人們社會的日常經驗和知識的積蓄中所提取出來的。唯物史觀不是離開地上

的人類生活的科學的殿堂。說不能從日常的生活關係中來學習唯物史觀的人們，這不在於不能學習，而是沒有知道學習的方法。

我並不是否定蘇聯的科學者們的史的唯物論之科學化的功績的人。我以為它是起於社會主義建設途上底一個科學的運動；國民全體的生活意義，被改造為社會主義的時候，這個別的科學化的運動，是再次轉換到綜合、普遍化的方向；但憑着他們之努力研鑽的功績，總算把史的唯物論的體系整理了，而且其個別的知識也成為顯著地豐富起來了。既然只有史的唯物論，是以人類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進行作為其內容；是世界史底認識的總計及結論；那末，它就必須拿世界史新的具體研究結果來作為它更新的内容。當作科學看的史的唯物論，決不是一刻就要達到具備化的體系的。

在蘇聯裏頭的世界史研究，近來已經是設法脫離引用、解釋、論爭的領域，而出版了很多關於各個部門的研究的值得注意的著作。現在雖然還沒有十分完善的世界史著作，但以「物質文化史研究所」作中心的這方面的研究，這要我們刮目以待於將來了。當作科學的史的唯物論的研究，雖然是必須不絕地採取這方面的具體研究的成果，可是到現在為止，關於史的唯物論的著作，不都是缺乏具體史料之研究嗎？米定、拉茲莫夫斯基共著的

「史的唯物論」若說到當作該書譯者看的我底感想，就它用正確的方針來指導研究當作科學的史的唯物論的這一點上，我承認它是有功績的；但從具體史料的結論來說，就它有很多的缺點，特別是引用文過多；文章也似乎累贅難讀。文章之所以累贅難讀，是由於筆者自己沒有清楚問題採納的方法，知識和材料的剪裁也都不夠的緣故。這是我近來這樣想到的。

本書在具體的史料的結論這一點上，在最近也算是收了相當的成果，可是因為它在蘇聯「大百科辭典」（一九三五年版第廿九卷）中的一小項目來寫的，所以在敘述說明的範圍，似乎都受到一定的限制。然而，正為這樣，把它作為入門書來讀，却是最適合不過的！

關於翻譯，因為考慮目下的情勢，而將原文省略刪除的部分也不少；對於各個的譯語也不得已加以多少增減；還有各章中的分節的標題，那大部分差不多都是譯者加進去的。

廣島定吉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 譯後記

目前，我們在中國所能看到的史的唯物論讀物是很少數的，就有也都是帶着不大正確之論點。爲了糾正我們過去對於史的唯物論的錯誤見解，爲了積蓄我們今後對於史的唯物論的知識糧食，我們都須要一本有系統的，正確的，科學的史的唯物論出現。這也就是本書翻譯的目的。

本書是在蘇聯的哲學威權者米定所鑑修的「大百科全書」中之一小部分。它主要的是依據蘇聯新社會建設的寶貴材料而寫成的，在這點上，爲過去的唯物史觀著作開一個新紀元，證明它隨着客觀社會發展而發展，揭破社會學的「圖式主義」的謬誤。其他如史料的豐富，及內容的「短少精悍」都爲本書的特色。我相信它出現在中國的現階段，其影響也許會不小吧！我在希望着！

日譯者廣島定吉先生在其譯序上，對於史的唯物論的重要性及意義，都已很清楚地闡明了，所以這里用不着我再來饒舌！



本書是據日譯本轉譯，其中有×的地方，都特別請日譯者廣島定吉先生填進去的，所以這裏要特別感謝他的好意！

本書雖然只不過是數萬字，可是自着手翻譯到現在為止，也花了四個月的工夫。雖然中間因為生活奔忙，把工作稍為停頓一下，此外都盡了十足的氣力，經過四五次的修改；然誤解誤譯，當不在少數，請讀者指正！

我不希望這本書賣得太貴，同時這本書的讀者對象并不希望是貴家子弟，只要有很低工資的人或苦學生都能夠得讀這個鬪爭的武器。本書的出版費大半是從友人募來的，所以我敢大聲向讀者說句便宜。但要是有人要拿「好物不便宜；便宜不是好物」這話來傷害時，那麼先請他讀過內容才說吧！

最後我要向子銓、林策二兄道謝一下，為的是他們對這本譯本無論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曾給過我莫大幫助。

康敏夫 一九三六年十月 日

## 第一章 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的思想家底唯物史

## 觀要素

## 一 唯物史觀發見之意義

唯物史觀（或稱史的唯物論）之發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偉大功績之一。『馬克思正像達爾文發見有機界進化底法則一樣，他發見了人類史的發展法則。』馬克思所發見的是這個：『人類在參與政治、學問、藝術、宗教等等之前，首先是非飲食、構造房子、穿衣服不可的。因此物質的生活資料直接生產，同時，某民族或某時代底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就形成爲該人類底國家制度、法律觀、藝術及宗教觀念發達的基礎；所以，這一切都應該從這個基礎來說明，而不能像過去那樣地叛逆，爲意識形態底成層所蒙蔽了的單純的事實了。』爲了唯物史觀的被發見，『從來歷史觀和政治觀所專橫的混沌和獨斷，才由指示社會生活底一個制度，作爲生產力底發展的結果，怎樣的發展到其他更高級的制度（例

如從農奴制度生長出來的資本主義（底可驚的，完全的，整然的，科學的理論來替代了。）

史的唯物論底發見的最大意義，就是最初使人類史的全進行能夠用唯一的科學的說明。可是，由馬克思看來，史的唯物論不僅是說明人類史的進行，而且說明，在勞動者階級必須知道「他們自身底地位和欲求的理解；他們自身解放之諸條件的理解。」（恩格斯）這樣地來抓住大眾，史的唯物論就必然地要成爲變革，改造現存社會關係的批判力。這樣一來，爲了史的唯物論底發見，在人類史上，才最初產生出說明人類史全體的，真正的科學的理論；以此爲基礎，又產生出了以科學爲基礎的人類史變革的理論。

## 一一 亞里士多德底唯物史觀的要素

在馬克思以前，也已經有人企圖說明社會的歷史發展底合法則性的嘗試了。例如：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十四世紀亞拉伯的思想家哈爾士，十七世紀的霍布士，十八世紀初的威哥及其他的思想家們都嘗試過了。這些思想家們，以爲支配人類社會的歷史的法則解說，是社會科學底根本任務之一，他們用各種的形式，提出而且解決了社會之合法則的問題；可是，他們對於社會生活的說明，到底還是觀念論者，所以不至創造出社會的發展之現實

的進行，其現實的合法則性。只有唯物史觀發見後，觀念論才從歷史中被放逐出去了，同時，在社會的思想史上實行了根本的變革（等於哥白尼的轉換），而產生出了真正科學的社會的，歷史的世界觀。布爾喬亞的社會思想，甚至在其發展的古典向上期（雖然和中世紀的鬪爭中，完成了一定的積極的任務），還是不能進展到唯物史觀的。

在古代世界底思想家之中，能夠特別地，強有力地表現唯物史觀之要素的，是亞里士多德底社會的歷史的見解。亞里士多德第一的把國家形態的差異，從人們的財產不平等和階級鬪爭中來說明。在構成國家底多數的家族中，『某人是豐富，別人是貧乏，第三者是有中等的財產。普通的國民是由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組織成的。高貴的人們，還是從富的程度來區別的。』統治形態，首先是由怎樣的社會羣掌握權力而區別的。亞里士多德特別提及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而如次地指出：『寡頭政治和民主政治底真正的差異標幟，是貧富底差異。所以權力——無論是少數者，多數者，任何方面都行——以富為基礎的時候，就成立寡頭政治；在無產者支配的時候，就出現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之各種形態，也是由民衆（無產者）之何種階級，就是說在農民、手工業者及日傭人中，誰占優勢而制定的。』關於帝王權，也是『從民衆爲了擁護特權階級』而產生出來的東西。帝王是由這特權階級

## 中任命的

企圖把統治形態和階級的存在及其鬥爭相結合着，在當時已經是天才以上的嘗試了；並且亞里士多德極力主張在國民生活中之經濟的發達底任務和意義。在共同態底最初的發展階段——家族——中；還沒有交換的必要，交換最初發生的時候，就是在統一的大家族分成爲幾個家族，人類感覺需要自己沒有的東西的時候。可是交換在這個發展階段中，只限於滿足人們的日常欲望。後來，從交易中交換發達爲「發財的技術」，從交易發生的必要，貨幣也發生了。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再三地強調亞里士多德底著作中之史的唯物論底每個要素，或接近於史的唯物論的論點。『亞里士多德底天才，是閃晃在從商品底價值表現中發見同等關係這一點上。只不過，他生活着的社會之歷史的界限，妨礙了他發見這個同等關係，其「現實」是存在在什麼地方呢？』在別的地方，馬克思也引用亞里士多德這樣的引文：「古代最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夢想過——『若果一切器具，都像那個德達拉斯底作品自己會運轉；黑菲斯特底三腳椅子自己會進行，做起事來像神仙一樣，根據命令，或自己豫知，而完成當然的事業，就是說若果梭自己能轉運機織，那麼，工頭就不須要助手，主

人不要奴隸了。」

雖然亞里士多德底每個言論，推測，無論怎麼樣是天才的，可是他底社會歷史，根本的還是觀念論的。

### 三 一十七八世紀布爾喬亞思想家之歷史觀的根本缺陷

到了中世的時代，在古代的思想家們（茲基提德斯、亞里士多德、普爾俾及其他）之著作中，所創造出來的社會的歷史的智識要素已經烟沒了，於是，它讓席給基督教的神意說，即是對於支配人類和民族底歷史的命運之神的攝理的信仰。布爾喬亞社會學底思想的覺醒，是和科學及文藝復興時代同時的。新與布爾喬亞，在與中世的意識形態底鬭爭中，作為理論底中心問題之一而提唱了決定論的問題。即是人類的行為，民族底歷史的生活，不是視為通過偉人、帝王、皇帝、或神的選擇的民族，來實現豫定目的之神底攝理的結果，而視為依自然法則的人類自身活動之結果。專受自然科學之發達而有了力量，被機械地解釋了的所謂諸現象之嚴格的因果性的原理，都可擴張到無論社會現象的領域或人類的行為之上。自然法的學說，給與社會學底思想之發達以很大的刺戟，在與封建的秩序鬭爭

中，又成爲以布爾喬亞制度之「自然性」、「永久性」及「合理性」爲基礎的理論武器了。然而，依照馬克思以前的一切思想家底社會之合法則性的解釋，總離不開有許多本質的缺陷的。第一是當他們底一切說明社會現象的時候，根本的是站在觀念論的立場。

「在歷史的領域中，舊唯物論以作用於歷史上之觀念的衝動力斷定爲諸事件之究極原因，其背後是以什麼爲基因呢？因爲沒有研究這衝動力原來是什麼東西，所以也反叛了自己。承認觀念的衝動力之存在不是不徹底的，但停留在這裏，不更求深進，不追究發生這衝動力的原因才是不徹底的。」所謂有着自然的永久不變「性質」的人類，當作依照同樣法則的自然之一部而考察出來的，那麼，理想的社會制度，非依照人性，依照理性之命令來建設不可了。「總之，從來的社會形態，國家形態，一切傳統的概念，都承認爲不合理的東西，都應該如塵芥一樣地捨棄。世界向來是被偏見所領導了。一切的過去僅僅值得憐憫和侮蔑罷了。」事實上不過是布爾喬亞理想化的天國的合理的社會制度，僅是依從人類底永久不變的，「自然的本性」而建設起來的。十七八世紀的布爾喬亞思想家們，雖然在這「人間性」的解釋中是不同的，但在這一點上，他們底一切都是一致的。所謂「人間性」的概念，就是布爾喬亞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個人的反映或理想像。當新與布爾喬亞的觀念

形態者們說明社會底政治之現象的時候因爲是從具備了感情和利害的這個「人間性」出發，所以不能更深進到「觀念的衝動力」以上，沒有明白這衝動力底物質之根源和原因，所以在歷史上，還是停留在觀念論的立場。

第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們，以爲人類的歷史全體都是誤謬和無知的結果，當爲人類不知道他們自身的本性的結果。法國唯物論者們，從意見支配世界之觀念論的立場出發，同時又主張反對環境決定意見，所以也撞到躲不了的矛盾。法國唯物論者們，像小孩轉磨磨兒一樣，總不能脫出這個圈套。甚至由地理的條件，首先由氣候的影響來說明國民和人類的的生活（例如：蒙特斯基）的思想家，也想克服一切布爾喬亞思想家共通的史的觀念論，但他們在歷史上，還沒有到採取唯物論的立場。社會現象底自然主義的說明，雖然以地理的環境之直接的影響，視爲人類的性格，行爲以及社會全體底組織之規定的原因，可是這種自然主義底見地，也不是社會的存在，國民生活之物質的條件；以國民性，國民道德，所謂國民底「一般精神」做爲社會的政治的事象底說明的出發點的，是在於和那個史的觀念論密接的合法則的關聯之中。但是在社會學上之地理學派的代表者的主張，雖然國民的「一般精神」其法則是由地理的環境之特定的條件所制約着的，可是社會生



活本身就直接被「國民精神」所制約着了。所謂進步論的信奉者們（康德、黑爾德、捷爾可、孔特爾賽及其他）也不能跨出史的觀念論的立場。即是他們以為依從永久不變的法則，與反覆「常常一樣的變化循環」（捷爾可）的自然現象不同，人類底歷史是漸次地越向完成更偉大的前進的。可是，當他們注意到人類漸進之運動的究極原因時候，却把它當作是人類底精神之本性的完成，知識的進步。

與十七八世紀底思想家們的觀念論有過密接的關係的，他們底社會歷史觀還有一個根本缺陷，就是對社會現象底機械的見解了。在這個時代，一切的科學中最發達的是地球及天體的力學。支配這力學的法則被普遍化了，被移到為數學的，力學的思想所侵潤了的所有的科學領域之上了。在社會政治的現象分析中，作為出發點的東西，是具有從自己保存的感情發出來的熱情和志望的個人。「在十八世紀的豫言者們的頭腦裏……這十八世紀的個人——它一方面是封建社會形態之解體的所產；他方面是從十六世紀以來所發達了的新的生產力之所產——是作為理想而溢露出來的，然而這理想的存在已成為過去的東西了。就是說這樣的個人不是作為歷史的結果，而是歷史的出發點。」將社會底全體當作其構成要素底個人之算術的總和來考察，在這全體中，諸種的社會力，即是在

人們的熱情與志望之間，成爲某種均衡而被確定了的東西。這樣一來，在機械的原子論底布爾喬亞世界觀之上，建築起了十七八世紀底一切的「社會契約」說，特別是盧梭的學說。這樣的見解底社會的政治的意味，是爲了布爾喬亞「自由的個人」（由封建的束縛的，）爲了給與這個個人在經濟的活動中絕對無拘束的自由而鬭爭。

十七八世紀的思想家們，對於社會現象底研究，採取了形而上學的態度；和社會之合法則性的自然主義機械論的解釋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每個思想家中的每個推測，都是分歧的，大體是因爲在十七八世紀還不能夠曉得發展的觀念吧！「在歷史的領域中，缺乏了對於事物底歷史的見解（恩格斯）。十七八世紀的思想家們，把人類看做從屬和自然全體同一法則的自然之一部分；以社會底自然的秩序，視爲與自然的秩序是同樣不變的確乎不動的東西，相應於這樣的見解，而應該變革改造社會的政治制度的任務，也就所謂哲學者認識和發見人間的本性；若果以這樣的知識爲基礎，由立法者表示實現適當的社會的政治制度，就一切事情都可妥當地解決了。這樣的社會歷史觀，是帶着觀照的性格，而忽視社會底物質的實踐，妨礙了作爲社會發展之起動力的國民大衆的鬭爭的，階級及政黨之鬭爭的重大任務之理解。

#### 四 十七八世紀之史的觀念論的進步性

以上是十七八世紀思想家們底社會的歷史觀之根本缺陷。各思想家都因為他們自己之階級的局限性，和其時代之知識的局限性，不能達到完成唯物論的歷史觀，發見社會現象之質的特性。可是在社會現象底領域中，他們底觀念論是帶着特殊的性質的。與現代布爾喬亞社會學之觀念論不同，十七八世紀思想家底觀念論者有着如次本質的特徵：

(1) 一方面和人類底精神的本質，其行為以及作為社會力之第一次底基礎的熱情的，合法則性的自然主義的解釋，密切不可分地結合着；另方面這個史的觀念論，是本質的傾向於神學及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它能夠從正面來否定神學嗎？（法國唯物論者）不然則要打破封建的宗教的形而上學的基礎，而創造出適應於布爾喬亞底欲望的新宗教了。這個史的觀念論底哲學的基礎，在十七八世紀思想家底大多數的場合，都是機械的唯物論。在歷史的領域中，這機械的唯物論就以論理的必要性，作為自然主義的機械論對社會現象之見解的結果，而變成觀念論了。（2）十七八世紀的史的觀念論，當新與布爾喬亞階級以布爾喬亞制度之「合理性」及「自然性」為基礎，而和封建的秩序鬭爭的時候，也當

作他們有用之理論的武器；而完成了一個進步的任務（3）最後這個史的觀念論的每個代表者，有着向唯物史觀的某種接近和其若干的要素。而且，這個要素的現存，是和封建社會之懷胎中的階級鬭爭底尖銳化的程度連繫着，和布爾喬亞階級實行對任何封建秩序的鬭爭結合着。以這個鬭爭的理論底概括爲基礎，布爾喬亞階級底每個思想家們，都達到階級鬭爭和法制的及政治的形態底聯結的思想；傾向了經濟的說明歷史事件底斷片的嘗試。例如馬基夫利分析意大利國家及古代羅馬的歷史時，是使封建貴族和國民之鬭爭密切地相關聯而研究國家形態及法律形式底變遷的，而且他也把貴族和加特力教會視爲意大利底衰微，市民的不平等，住民之間底美德衰頹，道德頹廢的根本原因。我們知道，馬克思是很高的評價了馬基夫利的著作的。他說「佛羅連斯的歷史是傑作。」從馬基夫利的「君主論」中抄錄了的，馬克思青年時代底筆記的大部分，都是關於階級鬭爭的問題，和階級鬥爭與政治形態之關係，革命的暴力的意義，政治與經濟之關係的東西。

威哥更明白地描寫着階級鬭爭，和法制的及政治形態之關係。在威哥看來，階級底集團的鬭爭，在創造國家及法律的諸形態這一點上，演着決定的任務。並且他也有着歷史事件底經濟之說明的萌芽。威哥區分人類史爲三大時代，（1）神代，是原始的野蠻的時代，那

時還沒有階級和國家。(2)英雄時代，是貴族的封建制度的時代。(3)人類時代，是市民的政治的平等時代，而且在這時代的末期，成爲道德的頹廢和淫蕩的結果，活潑新鮮的野蠻民族不能征服國家，既不是發展的新的循環之開始，則人類再陷於蒙昧的狀態。從這個見地來觀察的時候，就歷史成爲一個循環，作爲反覆循環的向上和後退的交代來考察。西歐諸民族，和希臘人及羅馬人再從同樣的地方開始，通過了同樣的根本的階段。當從一個階段推移到其他的階段的時候，在威哥看來，就負起決定底任務的，是以經濟的利害爲基礎的集團階級鬭爭。

在法國唯物論者之中，能認爲多少接近唯物論之歷史觀的，特別是在愛維西斯和他的後繼者們的場合。愛維西斯認感覺爲我們一切知識的源泉，認人類的感情，思想是由外在的環境所制約的；從而又爲社會上的人類地位，特定集團的所屬關係等等所制約着的；這樣，他又主張人類底見解，道德是爲他們底利害所左右着的，而向唯物史觀的方向進上數步。馬克思如次強調着：即是在愛維西斯唯物論是直接被適用於社會生活上的（愛維西斯「人間論」）爲感銘、自愛、享樂、正當所理解的私利，形成道德的基礎。然而愛維西斯，在歷史中也同樣不至克服觀念論。一面更徹底的貫徹了，說人類是環境的產物的，十八世

紀底唯物論的定理，他方也和其他一切法國唯物論者同樣，以爲社會的環境是意見底所產，所謂真正的社會力是熱情，社會是立法者創造出來的人爲的形成物。而且把國民及國家之安寧幸福，視爲是完全以人間性的知識爲基礎的立法。

唯物史觀的要素，在十八世紀的法國布爾喬亞階級革命之頃，和王政復古時代的布爾喬亞思想學說中，表現得最明瞭。這時代的布爾喬亞的觀念形態者，以第三身分對封建貴族之階級鬭爭爲理論的基礎，所以不得不證明布爾喬亞制度之歷史的必然性和進步性了。在捷爾可、納凱爾、重農學派（該涅）的場合，我們可看出關於階級及階段鬭爭的觀念來。在愛維西斯之社會的政治的學說中之唯物論的傾向，特別是把政治形態的變化，作爲密切地依存於各種社會集團，和階級（關聯於手工業之發達和人口增加）鬭爭來觀察，描寫人類社會底歷史的發展的一般形象底他的嘗試，在波爾涅、安捷安、巴爾那夫以及其他的著作中，能使其更加的發展着；在巴爾那夫的著作中，更能使其更高級的發展。在巴爾那夫的著作中，唯物史觀的要素表現得特別明瞭。巴爾那夫從各種所有形態底變遷的視角中，考察人類的歷史；於是，他把這個所有的形態，理解爲法制規範所確認了的財產關係。雖然在人類史的黎明期——民族民主政治的時代——人類幾乎還沒有知道所有

物，可是其後移到牧畜業（人口增加的結果），同時財產發生了，而且政治制度也成立了。因爲人口更加增加而產生出農業，土地也就成爲私有；適應這個私有，在政治的領域中，就成立了土地貴族的支配。然而跟手工業及商業發達同時，也就產生了富的新分配；產生了權力的新分配。像土地領有——巴爾那夫指出——使貴族出現了一樣，工業財產增高國民的權力，國民收回其自由，而開始政治活動了。即是說巴爾那夫在種種的所有形態底變遷中，給與階級鬭爭（貴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很大的意義。

## 五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唯物史觀要素

強調社會發展中之階級鬭爭及經濟的意義和任務，是在空想社會主義底學說中，特別鮮明地表現着的。作爲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發生的一個源泉，恩格斯舉出了聖·西蒙和傅利埃及文底空想社會主義。聖·西蒙在歷史上，是根本的站在觀念論的立場。他以爲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漸次地通過三個發展階段（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反寶證的）的人心底進步。但在這觀念論的學說中，也被表現出很強的唯物史觀之要素。聖·西蒙視爲由人心底進步所決定發生出來的經濟發達，它繼後又是制約和規定政治制度之交代的。

例如聖·西蒙由財產是從這方面移到其他方面之手來說明武門凋落和產業家底成長，這時，產業家底政治的勢力，是伴着他們經濟力底不斷地增進而成長的。聖·西蒙以產業家和封建領主底兩個社會的階級鬭爭，作為十五世紀以來的歷史的過程之主要內容。可是和布爾喬亞的啓蒙家，歷史家及經濟學者不同，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指出封建領主與布爾喬亞階級底對立抗爭，同時也指出第三身分內部底新的對立，布爾喬亞和普羅烈塔利亞的鬭爭。聖·西蒙在他晚年的著作中，是站在布爾喬亞社會中之「最多數」，「最貧乏」底階級的見地，來證明社會將移向新社會的政治的制度與其必然性。

傅利埃銳敏地批判了布爾喬亞的制度，文明，特別是商業。

他把一切從來的人類史底進步，總共區分為蒙昧期，野蠻時代，家長制度和文明之四個發展階段；於是他以文明期解釋十六世紀開始以來的布爾喬亞制度底意義。傅利埃把布爾喬亞的文明同「欺詐的傀儡」一樣看待，「不忌憚地暴露布爾喬亞世界底物質的及道德的貧乏。」指出了在文明時代「貧乏是由過剩本身產生出來的。」「在一定社會中的婦女解放底程度，是一般的解放底自然的尺度，這是他最初說破了的。」

還有一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渦文——他使社會主義的事業和現實勞動



運動所發生出來的形態結合着。他從「人類底性格一方面是天賦底產物，他方面是特殊的在發育期中之環境底產物」的十八世紀底唯物論的學說出發，實際的着手於社會關係底改革，反對作爲阻礙社會改革之道路的三大障害的私有財產，宗教及現在的結婚形態。創造出了許多徹廢階級差別及社會主義的社會改造的草案。但在歷史的領域中，空想社會主義者們到底是觀念論者，他們沒有使社會主義底實現和普羅烈塔利亞底階級鬥爭結合着，他們以爲社會主義是每個思想家啓示錯誤的人類，由上流階級底慈善家的協力和平地實現的；同時是某種絕對的真理。

## 六 王政復古時代之歷史家們和英國古典經濟學派

階級鬥爭底觀念，及在歷史中之經濟的要因底任務和意義的強調，在王政復古時代之法國歷史家們（狄愛利、希索、狄愛爾、米寧以及其他）的著作中，都有相當的表現。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在王政復古時代之歷史家的見解，是極度狹隘，偏狹的。縱然他們首先在布爾喬亞和封建領主的鬥爭中，找尋法國史說明的關鍵，然而他們同時却歪曲地描寫了這個鬥爭。他們一方面，把這個鬥爭作爲被征服者哥爾羅馬人（第三身分的祖先）對征

服者法國人（貴族的祖先）底一般民族的鬪爭來敘述；在他方面，一提出第三身分底內部鬪爭，即是布爾喬亞和普羅烈塔利亞之鬪爭的問題時，他們就僅作了「內部的和平，各市民階級間的和平，社會的和平」的說教。

在史的唯物論底準備期中，負起了極重大底任務的，是英國古典派經濟學者們；他們想以布爾喬亞之經濟諸關係的分析爲基礎，而克服十八世紀之思想家的自然主義和合理主義。我們知道，在十七世紀底後半期，英國經濟學者彼登已經主張社會底富的基礎，是勞動而不是貨幣了。關於價值，剩餘價值，價值和價格之差異等問題，威廉·彼登所陳述了的革命思想，到英國經濟學者，特別是斯密斯和李嘉圖使其更加發展了。斯密斯和李嘉圖研究經濟的制度，開闢了勞動價值說之初端。如依照李嘉圖的主張，布爾喬亞體系的生理學——其內在的有機的聯結和生活過程之理解——的基礎，出發點，就是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所規定的。李嘉圖從這里出發，捨除一切舊的習慣，科學地要求明白地理解這個科學所展開了的其他的範疇——生產關係和流通——是怎麼樣的跟這個基礎，這個出發點一致，或跟它矛盾……唯在這一點上，李嘉圖對於這科學才有歷史意義的存在。

## 七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

李嘉圖恰像黑格爾完成了布爾喬亞哲學的古典時代一樣，他完成了布爾喬亞經濟學的古典時代。在馬克思以前，根本的站在觀念論的歷史觀的立場的，以上社會學思想的代表者們的學說中，每個學說都有着某程度的接近於唯物史觀，有着某種「合理的核心」。而且在這一點上，它是首先強調在歷史中之階級鬭爭的任務和意義；確定法制的及政治的形態之階級鬭爭，及向經濟的發展的緊密的依存關係。雖然每個都是天才的推測，然而這些思想家們還是不理解社會發展底觀念的。尤其是在各個思想家的場合（進步論之信奉者——巴爾那夫和其他，）他們都有着這個的嘗試，就是企圖克服否定社會發展底觀念的十八世紀合理主義的學說；或以爲人類史如反覆的循環一樣的循環論（威哥、加姆巴涅拉及其他，）但這個嘗試把其發展解釋爲漸次的量的增減，也不成形而上學的進化論之圈套以上。雖然辨證法的發展觀念，也是以觀念論作爲基礎，但是最初意識的給與定式化的人是德國哲學者黑格爾。黑格爾比較他以前的思想家，最優勝的地方就是：第一，把社會的現象作爲歷史的處理；企圖使辨證法的原理也擴大到社會關係領域之上；發見

社會發展之內在的合法則性。在這一點上，黑格爾進到第十八世紀合理主義的理論以上了。黑格爾如次主張着——在歷史中，人們「自己雖然想完成其利害的滿足，正因為這樣，在歷史中就隱藏着一種較滿足自己利害更高的東西，這種他們不認識，不在他們的意圖中的東西，已經在歷史中被實現着了」（歷史哲學）。黑格爾「最初在發展的歷史中，發現內在的聯結。」（恩格斯）

然而，黑格爾哲學的根本缺陷（他的觀念論，革命的方法和保守體系的矛盾）也是宿命的影響到黑格爾底社會的政治的見解。黑格爾把理念底自己發展，視為歷史底過程之真正的基礎。馬克思指出他「把發展過程當作一切……人類的發展過程」來考察。這實在是從以後代平均個人置換過去的時代的人類，以後世的意識抑制前代的個人而來的。因為忽視了實在的諸條件的原故，這個空想，故能把歷史全體化為意識的發展過程了。於是，黑格爾以為絕對的世界精神是歷史的造物主；歷史本身是理性無限的展開，是理念的發展。「爲了自己的發現，各種原理才有了自己特別的世紀。」而且，在這個場合是「原理創造歷史，而不是歷史創造原理。」

在黑格爾看來，歷史上的活動家正像世界精神的「事務員」；正像這神祕的抽象的

自己意識的，人間一般的盲目的器具。世界史，若從理論的見地看來，就是在黑格爾的哲學體系中完成的；若從政治的見地看來，就是在黑格爾時代之身分的普魯士君主制中完成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的辨證方法，較之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論理學」更爲黑格爾哲學的保守方面所壓倒了，因此伊里奇一方面強調黑格爾在發展之觀念作成（雖然他站在觀念論的基礎上）的功績，可是同時也指出了這樣的事實：「一般的歷史哲學至多僅能給與極少數的東西——這是萬二分明白的事情。蓋因爲在這里，就是在這個科學部門中，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最大前進的緣故。所以在現在看來，黑格爾是時代的落後者，而且是最陳腐的。」可是，當黑格爾說明各個歷史事變的時候，偉大的歷史眼光，使他傾向到唯物史觀的某種萌芽了。例如：他主張「國家是地上的神的理念」，同時黑格爾這樣寫着：「只有在身分的差別已經存在，貧富亦甚懸殊，大多數的人們，用從來的方法，已經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的這樣的狀態出現的時候，現實的國家和現實的政府才能發生」（歷史哲學）。在其他的場所，黑格爾也強調着人間勞動的特性——當作自然征服的手段的工具發明。關於黑格爾，伊里奇舉出了史的唯物論這些的各個萌芽。

## 八 費爾巴哈

費爾巴哈雖然放棄了黑格爾的觀念論，採取唯物論的立場，可是他也和一切布爾喬亞的思想家同樣，不至克服在歷史中的觀念論。他的社會的歷史的學說出發點，是離開了時間與空間，在特定的生產樣式之外的抽象的人間。費爾巴哈的「人間」不是具體的歷史的人間。這個人間，若照恩格斯的尖銳批評，就不是一個女人人生出來的。它像蝶從蛹中飛出來一樣，這個人間是從一神教的神中飛出來的。因此，費爾巴哈的人間「還尾隨着抽象的神學的後光。」因此無論自然和人類，在費爾巴哈看來都是空虛的言辭吧了。「爲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間移到產生現實的人間，我們是必要在歷史的行動中去研究人間的。」費爾巴哈是不曉得從歷史的行動中去研究人間的。縱然有各個正當的言說，然而費爾巴哈還是用乾燥的空虛的抽象方法做事，而從其「本質」中引出人間一切的欲求。正因為這樣，關於社會及政治的學說，到處都是使他感到難於深入的領域。所以以費爾巴哈當作事實上唯物史觀的創始者的德波林主張，也是錯誤的。在他的場合，也僅可認爲停留在史的觀念論的一般的地盤，個別的接近唯物史觀吧了。論費爾巴哈的概論中，伊里奇記

着他的史的唯物論這些的個別的「萌芽」的「胚種」。

這樣，從以上所敘述了的一切事情，我們可以說，在馬克思以前，布爾喬亞的社會的歷史的思想，是不能進到真正科學的歷史觀；不能進到唯物史觀的。在布爾喬亞和封建制度最尖銳化的階級戰時代，每個代表者們，至多也只能接近於史的唯物論的個別的命題（階級鬭爭的觀念，經濟的發展和法制的及政治的形態的聯結，社會現象的歷史主義及決定論的觀念。）成爲布爾喬亞社會學潮流的這樣性格的根本原因，除其時代的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局限性，和不充分的發達以外，其餘都是他們底階級的局限性了。布爾喬亞的社會的歷史的理論之歷史的意義，就是在批判和論駁封建秩序，以及論證了資本主義之社會關係的「永遠性」和「合理性」。這個事實表示着：在布爾喬亞社會學思想的發展中，已經有了怎麼樣的界限？

第二章 形成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唯物史觀問題的

見解

## 一 史的唯物論的形成過程

唯物史觀首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基於先進資本主義諸國家中的普羅烈塔利亞底實踐鬥爭的經驗全體之理論的普遍化，而發見出來的。勞働者階級之批判的實踐，在一般的是馬克思——伊主義理論，在特殊的是唯物史觀最深的基礎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不以資本主義的諸關係的保存為利益的勢働者階級，他們是不會為布爾喬亞的視野之特色的局限性和主觀主義所煩惱的。他們的根本利害，是要求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特別是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的最徹底的、客觀的、正確的理解。在人類思想史上，最初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能以人類的全體歷史，和普羅烈塔利亞運動之經驗的理論的普遍化為基礎，批判地克服了布爾喬亞底理論的思想全體的局限性，完成正確的科學的社會發展理論。馬克思



和恩格斯所完成了的科學的說明人類史全體發展的合法則性的進行之唯物史觀這次（全體的和馬——伊主義理論同樣）更作爲最大批判的實踐力，作爲實踐的行動方法論而出現；它把意識性灌注入自然發生的勞動運動，指示和照明出勞動者階級他們鬥爭的道路。我們知道，恩格斯曾說過：「因爲有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的二大發見，社會主義才成爲科學的。」爲勞動者階級底意識形態的唯物史觀，在原則上是和一切布爾喬亞社會的學說不同的。就是說在這個唯物史觀之中，和在整個馬克思主義中同樣，無論如何也不像那個從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中脫離而發生的，被閉鎖和骨化了的學說，有這樣意味的『宗派主義』。

馬克思主義是人類思想一切積極的成果底正當的承繼者。若從思想的承繼的見地看來，就馬克思主義是以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底批判的克服和改作爲基礎而成長的。因此，爲馬克思主義底構成部分的史的唯物論，也意味着布爾喬亞科學一切積極的成果的，首先是馬克思主義底三個主要源泉的科學的，全內容的批判的攝取。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史的唯物論的形成，是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底發展的密切不可分的關係中產生的。在這個場合，這些見解，並不像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們所敘述

的一樣，是作為純理論的思想過程之結果，而展開與形成的；它是基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實踐的活動；是由他們從急進民主主義的立場移向到勞働者階級的見地；同時又是由他們在勞働者階級對資本主義底鬥爭的許多實踐的指導的時候理論的把握人類的全體歷史，理論的概括勞働者階級運動的全經驗所形成的。

## 二 唯物史觀的誕生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發展初期階段中，是作為急進民主主義者而活躍；他們尖銳地批判現存封建的與布爾喬亞的秩序，擁護都市及農村的勤勞大眾的廣泛階層的利害。政治、法律、宗教的問題，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的中心。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時期中，以自己的政治見解為哲學的基礎，看出了黑格爾學說革命的測面。他們從最初起就反對老人。黑格爾學派，努力『從黑格爾哲學中引出無神論的革命結論』（伊里奇）；馬克思和恩格斯雖參與青年黑格爾學派，然而他們却反對費爾巴哈的主張，在許多重大的問題中，和青年黑格爾學派分開了；他們從黑格爾脫離出來後，則進行和青年黑格爾學派之方向原則不同的獨自的道路，在馬克思當「萊茵新聞」編輯的時候，他在實踐上碰到了各種階

級鬥爭的焦眉的問題，同時，馬克思一步一步地確信以黑格爾哲學及歷史哲學為謀國民大衆底真正的利害之鬥爭的理論基礎，是不中用的。例如：是處理關於出版自由的討論批判，山林盜伐法等論文中，馬克思都這樣寫着：各身分和階級都欲把國家化成擁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機關，「把國家底全機關變成耳、眼、手足、來幫助它聽、看、守、評價、警備、避免森林所有者的利益。」馬克思在這個時期，還說國家是表現國民精神底一般的自由，這樣固然可以說馬克思是站在黑格爾派的觀念論的見地，但馬克思參加階級鬥爭的實踐，直接的參加政治鬥爭的實踐，越發使馬克思（和青年黑格爾學派不同）從黑格爾哲學底抽象的高廈降下來；使他傾向到經濟關係的實在地盤，次第的探出國家及法律形態的地上的根源。無論政治、法律的問題以及這時代的極緊急的問題——宗教問題，馬克思和青年黑格爾學派不同，他並沒有把宗教作抽象的理論的批判。即是，馬克思這樣指出——「反宗教鬥爭，間接上是對於為宗教它的精神源泉的世界鬥爭。」宗教當其原理倒轉了的實在性的消滅時候，同時宗教也自己使自己死滅了。根據前頭的話，固可以說馬克思無論在哲學中，在歷史哲學中，都還站在觀念論的立場；但在「萊茵新聞」（一八四二——一八四三年）的時代，他已經漸次的從黑格爾離開；漸漸地知覺從黑格爾底抽象的自己意識走

向實在的社會關係和一切社會關係之基礎的社會經濟構造的道路上。

馬克思主義創始者的這個方向的決定的前進，在「德法年報」特別是在「神聖家族」中實行了。若從政治的見地看來，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發展，就是他們兩人從急進民主主義的見地移行到普羅烈塔利亞的立場時代。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的論文中，馬克思最初清楚地採取了普羅烈塔利亞的立場。又從哲學的見地看來，就這個時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從黑格爾底觀念論的立場移向唯物論哲學立場的時代。他們這個推移，是受費爾巴哈底決定的影響而發生的。費爾巴哈是與黑格爾的觀念論和青年黑格爾學派分手之最初的一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決不能夠否定，在十九世紀底三四十年代的德國，對於黑格爾底思辨哲學的優勢和支配翻起了叛旗的，費爾巴哈底唯物論之偉大解放的革命的意義的。但是我們和普列哈諾夫，少數派的觀念論的主張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還未曾是徹底的費爾巴哈主義者。他們雖然受費爾巴哈唯物論一定的影響，但同時對於費爾巴哈的局限性，缺陷，抽象的人類的崇拜和他的唯物論底觀照的性質，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

在「萊茵新聞」的時代，若果說是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們，已經探出了從所謂觀念的

合理的國家法的黑格爾理論底抽象的絕頂，移行到唯物史觀方向的道路的話，那麼，在繼續的時代，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採取普羅烈塔利亞的立場，整理唯物論哲學，清楚地和黑格爾底社會哲學分手，到達唯物史觀完成之道路的时代了。在各種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爾的國家哲學及法律哲學做爲德國歷史的理想的繼續；把這個哲學做嚴格的致命的批判了。爲了改造現實，馬克思曾強調了批判的實踐的意義。他主張普羅烈塔利亞在哲學中，非找出對現存制度鬥爭的「精神的武器」不可；同時強調了現存制度，只有在批判的實踐的過程中，才能夠粉碎的。「批判的武器，當然是不能以武器的批判去代替的。雖然物質的力量必須由同樣的物質力量所轉覆，但理論一抓住大衆，它就會變成一個物質的力量。」在「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中，馬克思清算而且克服了在一切布爾喬亞世界觀中，固有的理論和實踐的分離。

屬於這個時期（「德法年報」時代）之馬克思的經濟和哲學原稿中，馬克思並沒有把他和同時代的國家當作理性和自由的表現；而是把它作爲十八世紀之法國革命的結果而發生；作爲特定的社會諸關係的結果來考察。同時馬克思在經濟學的原稿中，暴露了勞動和資本對立之不相容的關係；把當作資本主義諸關係的辨護論看的布爾喬亞經

濟學加以批判。馬克思於是確認生產過程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在這樣的意義中，馬克思又這樣地指出：「在勞動者對生產的關係中，包含着一切人類的奴隸制。一切的隸屬關係，不外是這關係的變相或其結果。」這樣，從普羅烈塔利亞的立場來批判布爾喬亞的經濟學，馬克思是接近到史的唯物論的根本觀念——生產關係的觀念了。這個根本觀念，在「神聖家族」中，尚且可以找出更明確的徹底的告成。在這個著作中，無論是普通人的觀念（如法國唯物論者的場合），或是像黑格爾一樣被外化，被神祕化了的形態觀念，總之是以觀念看做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的，觀念論的社會的歷史的理論，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它加以詳細的批判了。和這個觀念論的社會學說相反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人類的活動」從人類對自然的實踐關係，從當作一切社會現象之最深的基礎看的物質的生產出發的。「批判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以為從歷史的運動中，除出人類對自然的理論的及實踐的關係，自然科學和產業，也可以到達歷史的現實性的認識。初端他們以為：例如不認識當時代的產業，生活自身的直接生產樣式，也可以實際的認識是怎樣的歷史時期。」伊里奇在「神聖家族」的概論中，添寫了馬克思這樣的話：「當作對人的存在看的，當作人間之對象的存在看的對象，同時是爲了他人的、人類的存在，是他對

他·人·的·人·類·的·關·係·，是·人·類·對·人·類·之·社·會·的·行·爲·。」伊里奇對於馬克思這樣的命題，這樣附註着：「這個地方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它表示着馬克思怎樣的去接近他自己的全「體系」的根本觀念，說得可當一點，不外就是馬克思怎樣的去接近社會的生產關係。」

這麼，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們，分明的放棄了一切觀念論的社會歷史觀，而站到物質的利害的見地，站到當作一切社會過程及社會現象之真正的基礎看的物質生產的見地了。從這里出發，在「神聖家族」中，他們已給與史的唯物論許多根本範疇的一般的定式化了。他們使國家及法律形態與特定的經濟利害或階級結合者，而來解明社會發展中的階級任務和意義；規定普羅烈塔利亞的歷史使命；強調了當作新社會建設之必然的條件看的社會的變革意義。總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雖一面批判了一切觀念論的歷史學說；但同時實際上是和費爾巴哈底人間觀一般的，及在社會歷史之外的抽象的人間底他的崇拜分手。關於這點，恩格斯這樣說着——「要取代費爾巴哈底新宗教核心的抽象的人間崇拜，是應該在其歷史的發展中，去研究現實的人間的。比費爾巴哈底見地更進的論作，是在一八四五年由馬克思在其「神聖家族」中開始

的。」

在「費爾巴哈提言論」（一九四五年）中，馬克思以社會的生產的及革命的實踐作爲存在於社會發展之根柢的原因；作爲了說明社會現象，它爲了實踐的改造，都應該是其出發點的，而給與關於這個實踐的觀念的古典的定式化。「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這樣來觀察社會生活時，就是消滅了「抽象的孤立了的個體」的費爾巴哈的見地和馬克思以前，爲社會的思想的護身神的有名「人間的本質」而出現「社會諸關係的總體」了。

唯物史觀底更進步的形成，唯物論底「登峯造極」的告成，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一八四五——四六年）在這部著作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使唯物史觀底一切的根本命題做成定式化了。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反對觀念論的歷史觀；他方面就把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這樣簡約了。「這個歷史觀是存在於次：即是從直接的生活底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活過程，把和一定的生產樣式結合，而且從此發生出來的交通形態，即是把在各種各樣的階段中的市民社會，作爲歷史全體底基礎來理解。其次是敘述當作國家看的這個市民社會的活動；同樣的從這市民社會來說明所有一切的理論的所產，意



識形態、宗教、哲學、道德等等從市民社會的各階段中追上其生產過程，正因為這樣，所以不用說是能夠敘述整個的過程（和過程的各種側面的交互作用）的。這個歷史觀和觀念論的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各時代上探索出什麼的範疇，它是常常站在現實的歷史的地盤上，它不是從理念來說明實踐；不用說，正因為它是從物質的實踐來說明觀念的構成，所以達到如次的結論。即是意識的一切形態和所產，既不是由精神的批判，也不是由在「自己的意識」上解消它們，或當作「幻想」、「幽靈」、「妄想」等東西所能廢棄，只有由實踐的轉覆為觀念論的虛妄所產生的實在的社會關係，才能廢棄的。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給與關於社會機構學說的輪廓（歷史的所有形態的區別、氏族的、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最初給與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學說的定式化。同時也在這裏給與社會的變革法則底明白的定式化。這樣，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唯物史觀的一切原理，都經馬克思和恩格斯大綱地敘述了。即是說馬克思在這部著作中，最初發見出人類社會之根本的發展法則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初期著作「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神聖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等中，都闡明了當作新社會底建設者看的普羅列塔利亞的世界史的意義。

### 第三章 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

#### 一 辯證法的唯物與唯物史觀之內在的聯結

在下面這點上，伊里奇把它視爲馬克思底最大功績之一。就是一馬克思使哲學的唯物論更高的發展，使它更深的推進；使自然的唯物論的認識擴大到人類社會的認識上。唯物史觀是「徹底的使唯物論延長擴大到社會現象的領域之上的東西。」伊里奇既強調着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之間的不可分的內在的聯結；復這樣寫着：「在成爲渾身一體的這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就是一個根本前提，一個本質的部分也絕對不能把它從客觀的真理分離；不能給布爾喬亞反動的虛偽所抱去的。」

使辯證法的唯物論擴張到社會關係的領域之上，史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唯物論遂成爲密切不可分的統一了。把辯證法的唯物論從史的唯物論切離，使哲學問題和史的唯物論發生矛盾，要忽視這一點，正是辯證法唯物論之歪曲。反之，把史的唯物論從辯證法的

唯物論中切離出來的，是潰破史的唯物論的基礎；歪曲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在戰前第二國際的內部，馬克思主義底新康德主義的修正與馬赫主義的修正，都把史的唯物論從辯證法的唯物論中切離出來，同時否定了兩者之間所有的聯結。修正主義者們，以這樣的聯結為不當；他們把馬克思主義還原作社會的歷史的學說。其次是把新康德主義，馬赫主義的哲學基礎，裝進馬克思主義了。德國社會民主黨所公認的理論家考次基，也活躍在新康德主義者和馬赫主義者對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統一戰線上了。馬克思主義沒有哲學——他這樣的對修正主義隨聲附和——這無論和新康德主義，特別是和馬赫主義都是一致的，在這點上，沒有什麼可責備的，有害的地方。一九二七年，考次基在攻擊史的唯物論的二卷大著述中，做成自己修正主義的總決算，而拿出了布爾喬亞社會學底亞種的他自己的「史觀」。

反對辯證法的唯物論，而把其他哲學的基礎裝進馬克思主義中的，是有着一個政治意義的。要是不完全地歪曲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特別是唯物史觀，就是潰破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依新康德主義所修正的馬克思主義底「倫理的」基礎的，是機會主義者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的鬥爭旗幟；是以階級調協的觀念，以「資本主義」「平和的」

轉生到社會主義的觀念，代替這個理論的。可是，馬赫主義底裕流進化論的順應說或是均衡說，其使命是給與「社會民主主義的俗物」底天天的順應政策以正當化；給與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底和平的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以理論的基礎。繼續德國和奧國社會民主黨的著明的代表者之後，蘇聯的馬赫主義者們（波格達諾夫，巴查洛夫，尤休客菲奇以及其他）也對辯證法的唯物論實行系統的鬥爭，想使馬赫主義和史的唯物和解起來。他們和其他一切馬克思主義之偽造者們同樣，把物質社會生產的實踐，解消為精神的東西。他們拿出史的觀念論來反對在社會的歷史的科學中的唯物論的原則，而把社會的意識和社會的存在一樣看待了。波格達諾夫在一九〇二年曾經這樣寫過：「社會生活是經過一切的發現，而是意識的心理的……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在正確的意義中，是一同的東西。」對於社會的意識和社會的存在的關係如何的問題，這個觀念論的處理，是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反對史的唯物論之根本問題的鬥爭，有着密接不可分的連繫。觀念論的歷史觀，成爲政治和經濟的分離，成爲否定政治鬥爭之客觀的經濟基礎而出現，將政治（作爲「民主主義的政治」解釋）化爲社會發展底獨自的要因（考茨基之民主主義的世界史觀）成爲當作歷史的起動力看的階級鬥爭之否定而出現了。史的唯物論，從第

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和一切馬——伊主義之敵人（托羅斯基以及其他）受到最狂暴的觀念論的攻擊的，不外都是關於這些根本的問題。

## 二 唯物史觀最初的根本問題

企圖使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史的唯物論分離來覆滅史的唯物論的根本概念，對以上一切潮流的鬥爭中，馬——伊主義從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之內在的不可分的聯結出發，把唯物史觀視為擴張辯證法的唯物論到社會現象領域上的東西。把哲學的唯物論擴大到社會關係領域上的，就是首先表示着：關於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惟和存在之關係的問題——就是關於社會的發展和認識，怎樣的為唯物論所解決了呢？只有從這里出發，才能在社會的歷史的科學唯物論與所有一切形態的觀念論之間，引出分界綫來，同時又能指示出反映社會的經濟的構成發展及交代的一般形態和法則的，史的唯物論的根本範疇之具體的相互聯結。伊里奇從哲學的根本問題——思惟和存在之關係的問題——出發，對史的唯物論最初的根本問題，給與沒有遺漏的提出和解決。『唯物論一般是承認客觀的實在的存在（物質）是能從人類的意識、感覺、經驗等等獨立出來的。史的

唯物論認為社會的存在是從人類社會的意識中獨立出來的東西。——唯物論一般是從存在來說明意識的，要不是相反的話，就被適用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唯物論，是要求從社會存在來說明社會意識的。」

在右面伊里奇的文章中，對史的唯物論最初的，最一般的問題（和其哲學的基礎密切的關聯中，）都能給它以非凡的正確的特徵，又能明白地引出在社會的歷史的科學的唯物論和觀念論之間的分水綫。在社會的歷史的科學的各傾向和潮流，首先是爲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所規定着的。從社會的意識獨立出來，而且完全地規定着後者的社會存在底客觀的發展出發的人們，形成一切在社會學中的唯物論者的陣營。反之，以意識形態爲社會分析的出發點，以理性，意識，意志等等的發展爲社會發展的基礎及起動力的人們，在社會學中，就加進了觀念論內部的種種潮流。在社會的歷史的科學中，觀念論的發現形式和道程，和在哲學的領域中，是同樣的複雜，爲各種各樣的形式所隱蔽着的。觀念論時常都很注意用隱蔽的形式侵入科學的領域中去的。雖然要求同時克服史的唯物論和史的觀念論，但在其理論的發展中，已經達到明顯的觀念論的，中間的折衷的學派和小學派（把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求之社會以外——生物學的法則？地理的條件？人口增加？或生存競爭

爭等等——的自然主義的潮流也屬於這種，在這里同樣的也是極多種多樣的。

於是，在社會的歷史的科學中，適當的唯物論的原理，是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底統一，在這個場合，「社會的存在是從人類社會的意識獨立地存在着的」（伊里奇）就是說存在對社會的意識是第一的，而且規定着社會的意識。這個命題就是史的唯物論的基石。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定而且承認：成爲社會分析的出發點的，第一是物質的生產，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構成社會存在的根本的規定內容的社會經濟構造。將唯物論擴張到社會科學的領域上的，第一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樣式限制着社會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

區別出了社會的經濟構造和建立在經濟上面的社會的，政治的及法律的諸制度，以及爲它所限制着的社會意識形態；畢竟在社會的經濟構造——它通過人類史的全體（原始共產主義除外）在階級鬥爭過程中發達了——中，找出社會生活說明的關鍵。由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將觀念論從社會的歷史的科學領域中，驅逐出去，在歷史中，最初「登峯造極」的把唯物論創造出來。

## 二 社會經濟的構成態概念

使辯證法的唯物論擴大到社會現象的領域上的，不只是承認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的優位性。而且史的唯物論者，都是在其不斷的辯證法的發展中，在其歷史的規定性和具體性中來考察社會的存在，以及被它規定着的社會的意識。社會也和一切的自然同樣不是不變的東西，它是在不斷地繼續發展，而且這個發展是辯證法的進行，即是通過內在的矛盾；通過漸次性的中斷，飛躍，階級鬥爭及革命；通過舊的東西的否定和新的東西的發生，新舊兩者的鬥爭而進行的。馬——伊主義以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作為不斷地變化，發展的東西來考察。每當社會存在變化的時候，雖然是或早或遲，可是社會的意識也得變化，「時代的精神，」——國民的性格，「人類自己的性質」也得變化的。例如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為有怒濤一樣的增進，跟着就有勤勞大眾自己底意識的大量變革；跟着就有對勞動的新的關係，和社會主義的所有的，社會主義的規律，行為規範等等的製作。使農民從個人的小經濟移向集團的大經濟底道路的，是製造「爲了改造農民，改造他們的心理爲普羅列塔利亞社會主義底精神的根本基礎。」在這個場合，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



「人們的意識，在其發展中是由他們事實上的地位所遷延着的。」例如「集體農場的農民——在一九三三年，史太林這樣地指出——若從他們的地位上看來，雖然已經不是個人經營農民，而是集團經營農民，可是他們的意識，到現在還是舊的，私有者的。」理念的進行，在密極中看來，是由經濟諸關係的發展進行所規定着的，這就是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在階級社會的經濟構成態中，社會存在同時社會意識的發展，也是在各種階級鬥爭的形式中進行的。就是說，支配階級的意識，在社會中常常作為支配的意識而出現。要是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成為在社會中的支配的意識形態，那麼，在蘇維埃聯邦中，當做支配階級的普羅列塔利亞的世界觀看的馬——伊主義，在強烈的鬥爭中，它一方面是決定的驅逐了資本主義分子的意識形態，以廣汎的農民，小布爾喬亞大眾的意識，改造為社會主義的意識，他方面它又滲透到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

於是，僅僅一般地來說明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統一，還是不夠的。社會的存在對社會的意識是第一的，單這樣主張也是不夠的。無論何時，我們都應該在跟它有着固有的階級矛盾（在敵對的構成中）的歷史上特定的發展階段上，來考察這個統一。在各歷史的發展階段上，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是成為跟它有着固有的性格和合法則性的一個

具體的統一的。在這個場合，成爲這個統一的基礎的，是在一定的構成態中固有的社會經濟構造，同時這個構造，是跟着在其上面建立起法制的制度和跟它對應的社會意識形態。這樣，在放棄了抽象的，形而上學的，無內容的社會「一般」的規定之後，史的唯物論把辯證法適用到社會同發展，同時給與社會經濟的構成態的概念。所謂社會經濟的構成態，到底是在人類的發展中的特別的歷史階段；是歷史的特定的特殊的社會存在形態，是在人類的發展中的一個巨大的歷史時代；同時在其各個中都是有着固有的特殊合法則性的特殊社會有機體。

從作爲構成態的規定的基礎的經濟構造出發，馬克思主義的古典家們，區別出如次的五個社會經濟構成態。原始共產主義的構成態，古代的（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封建的構成態，資本主義的構成態，社會主義的構成態。古代的，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構成態，是階級的或是敵對的構成態，因爲它有着固有的幾多性格的特徵，所以和先階級的（原始的）構成態及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構成態是不同的。社會經濟構成態的學說，可以在其密切不可分的統一中，在其交互作用和發展中，來考察出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們通常從社會的全體化爲抽象；化爲個別化了的範疇和獨自的「要因」的這種社會生活的種種側

面（經濟、國家、法律、藝術、科學、宗教等等），而樹立起對社會生滯的綜合觀。這個學說把全體人類的先史（原始狀態除外）作為階級鬥爭的歷史來考察。只有從這個學說出發，才能夠漸次的理解真正重大的歷史上的大事件；才能夠規定在社會史上的各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地位和意義。

因此，將辯證法的唯物論擴大到社會關係的領域上的，就是說在社會科學中，辯證法的唯物論者，不僅承認社會的存在對社會的意識是第一的；而且把社會的發展作為各種構成態底交代之一的自然史過程來考察，而表示着從一個經濟制度到其他的制度是怎樣地發展的。

## 第四章 社會的合法則性問題

### 一 社會的法則和自然的法則

從社會經濟構成態的理論出發，是能夠正確地解決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的問題，具體的規定史的唯物論的對象的。在社會的合法則性問題中，布爾喬亞觀念論的社會學，不是站在自然主義的社會合法則性的見地，就是站在使社會的法則和自然的法則原則的相對立的見地。在前者的場合，是想由生理學的法則，生存競爭，地理的環境條件，人種的鬥爭，人口增加等等來說明社會現象的。在後者的場合，是想原則的把社會現象的領域從自然現象中區別出來（黑喀爾特、文德魯巴特）；同時主張：自然科學的任務是使個別的事實普遍化，給它以系統化；把「諸現象」裝進一般的法則；可是相反的，歷史的對象不是一般的，是單獨的不反覆的，也並不順從怎樣的普遍化。歷史家不應把一般法則的定立作為其任務；而應找出和發見個別的，不反覆的，「從文化價值來發見」重要的東西。例如宗教、

法律、國家、道德等等的東西。

所謂心理學派（其內部有着多數的學說和體系）的見解，雖然在布爾喬亞社會學中，很廣大的普乃了，但這學派是把社會的力作為心理的力來觀察把社會學建築在心理學的法則之上的。布爾喬亞社會學底性格的特徵之一，是不能發見社會法則的特殊性，和自然法則的統一；同時也不能發見前者和後者的質的差異，而且也是不願意發見布爾喬亞社會學者，雖在企圖以社會現象的特殊性為出發的場合，也不願把社會的存在，其物質的基礎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而且他們也不能夠把這個基礎作為分析的出發點。結局還是歸還到抽象的自然主義，心理主義；不然就至多也僅能停留在表面的經濟主義的概括吧。從這個見地看來，值得我們注意的事情，是在布爾喬亞社會學者之間，一般公認的科學分類；但其中是這樣主張：更低次的運動形態（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等）法則，在更高的形態（在現在的場合是社會學）看來，它不是作為從屬的法則（像恩格斯所主張的一樣）而是完全獨立，或和更高的形態平衡作用着的。這個理論，康德已經提倡過了，而且在一切的布爾喬亞社會學中，幾乎得了市民權。這個方法論的基礎，就是把一切複雜的形態還原作單純的形態，視為科學最高任務的這種機械論的實證論的見解。

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的關係是怎麼樣的問題，只有把社會存在的客觀理論，就是說只有把社會的發展和成爲其合法則性之最深的基礎的，歷史上特定的物質生產形態，作爲社會學的分析出發點的場合，才能夠正確地解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在物質的生產中，在勞動中，發見從動物羣中把社會區別出來的社會之質的規定性。而且，勞動差異的標識就是生產手段的生產。布爾喬亞社會學的思想，連提起近於這樣的問題也是不可能的。別說這樣，就是對於階級鬥爭的理論，也從這唯一的正確的出發點離開，次第地疏遠了社會學的思想，正因爲這樣，所以他不能夠解決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之交互關係的問題。

## 二 社會法則的特質

「這些個人之所以能從動物區別出來的最初的歷史的行動，不是他們思惟出來的，而是他們開始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發生出來的。」「要從動物中區別出人類來的，無論意識也好，宗教也好，他們總得用一般愛好的東西。人類自身當他們剛一開始生產必要的生活資料，這樣就是他們自己從動物中區別出來的時候。」爲了能夠「創造歷史」，故人類必定可以生存下去。但爲着要生存下去，無論如何，除了飲食，蓋房子，穿衣服外，還要做工

作。於是最初的歷史行爲，就是滿足這些慾望的必要的手段生產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產。」

依照恩格斯的話，就勞働是「製造人類本身。」勞働是把人類社會一般從類人猿羣中區別出來的。因此，史的唯物論創造出在社會中的現實關係和統一，同時也把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基礎，求之規定人們意識和意志的，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因此，當伊里奇和觀念論的社會學的學說鬥爭的時候，他曾再三地這樣強調。即是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是和人們的意識，意志相獨立的，即是不理人們怎樣歪曲地解釋這個合法則性（像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或正當地解釋它（普羅列塔利亞之認識，）它都是帶着一個客觀的性質而存在的。史的唯物論，在社會合法則性的解釋中，原則上和宿命論學說及主觀主義的學說都是不同的。即是前者是把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求之人類的活動之外；排除在歷史中的個人的積極活動；後者是認社會合法則性的根源爲主觀精神的能力。史的唯物論又確定了這樣的事情：即是「人類創造他們自己的歷史。」在這個時候，人類的這個物質社會的生產活動，是帶着一個合法則的性質的；不理人類是意識的計劃的創造人類（在社會主義的場合）呢？還是自然的社會發展的盲目的必然性——和他們自己同樣的活動——的奴隸（像人類先史之全體的場合，）它都是有着一個客觀的內在的論理。只有這樣

解釋社會合法則性的時候，像在後面所看見的，在歷史中說明個人積極的任務，才有可能。史的唯物論的任務，就是正確地發見社會發展的這個客觀的特殊法則。

社會的發展是不能從地理的條件影響和生物學的法則來說明的。我們知道，普列哈諾夫對涉及社會發展的地理環境的影響，給與了過度的意義。普列哈諾夫以爲「在究極中，規定社會關係全體之發展的，生產力的發展，是由地理環境的性質所規定的。」再而這樣指出道：生產力的最先的發展是「依隨它自己內在的法則」而進行的，可是生產力發展之最初的原因，若果依照普列哈諾夫的話，就是地理的環境，說它是規定生產力的發展的。不用說，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的自然基礎；是制約着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一切歷史的記述，不能不從這些自然的基礎，和依據人類行動的歷史途上的變形出發。」縱然是這樣，然地理的環境是不能規定社會發展的。地理環境影響社會的事實本身，其影響的程度、形式、性質，只有從社會發展的一定的階段才能說明。社會和環境的關係，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的事實本身，在究極中，無論何時都是被生產力的狀態所規定的。這方面的明顯實例就是蘇維埃聯邦。在比較短時期之間，像怒濤般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結果，在蘇聯，社會和地理環境的關係是根本的起變化了。爲了莫大的天然富源的開發（根據社會主義的經濟）



多涅波水力發電所和白海運河建設等等，蘇聯地理的狀況也根本變形了。這樣，被地理環境的影響所制約了的經濟發展，使地理的環境變形；同時地理的環境也規定着波及社會發展的影響程度和形式。這樣，在各歷史的瞬間，地理環境波及社會的影響性質，是被社會發展的內在的法則性所規定的。

關於人口增加會波及社會發展進行的影響，也可以和以上同樣的來說明。不能像一般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從人口增加的密度來說明社會發展的究極原因的。「人口增加的條件，是怎樣的直接依存各種社會的有機體結構，同時人口則法，對於這些有機體的各個問題，都應在個別的去研究，而不能「抽象的」和歷史上相異的社會結構形態沒有關係的去研究。」伊里奇對斯魯勃這樣指摘着——無視歷史上特殊的社會關係的體系；生產樣式抽象化；依照繁殖和生活資料之一致的公式，而樹立起抽象的人口法則是不可能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條件之下，所以發生人口過剩的事情，是因為資本支配生產，減少必要的勞動者數目，製造出過剩的人口的緣故。

史的唯物論承認一般的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的質的差別性，但同時反對兩者的絕對的對立。在史的唯物論看來，社會發展的法則，是作為支配自然、社會、人類的思惟的，辯證

法的一般法則的特殊形態來考察社會也和自然同樣是辯證法的發展，即是通過內在矛盾裏面的飛躍，革命，舊的東西的否定和新的東西的發生而進行的。從這個見地看來，史的唯物論不但承認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的質的差異，而且也承認兩者之一定的統一。社會和其餘的自然之間的這個統一，是在社會的勞動過程中被實現出來的。

關於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的交互關係問題，非預先舉出史的唯物論之機械論的，自然主義的修正的種種試驗不可。機械論者們，把法則作為諸現象間之外的關係來解釋。正因為這樣，他們才不把社會根本的合法則性求之社會的內在的自己發展，而求之社會和自然之外的關係。例如：布哈林仿效着波格達諾夫從均衡論出發，以為社會發展的內在的法則性，是完全依存於社會和外的環境之間的均衡；成爲內在的矛盾的東西只是這個外的矛盾的職能。把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及其究極原因，求之外在的環境的變化的這個機械論的均衡論，是最徹底的公然的貫徹了考茨基戰前時期的東西。例如：在「自然和社會的繁殖及進化」中（一九一〇年）考茨基就這樣說了。社會的發展，有機體的進化，都是「由一般的，完全一樣的，物質的，即是對外的生活條件的順應而進行的。」「對於世界全體以及無機界也有共通的法則。」一切的肉體形態都是被其外的環境條件所規定的。」

在「唯物史觀」（一九二七年）中，考茨基把下面這點誇獎為自己的功績。即是，他把人類的歷史，只作為在有機的生命歷史中的個別的場合來考察；同樣支配着人類的發展，動植物界的進化的一般法則，社會以及所有各種的變化發達，都是四圍的環境變化命令它的。要是這個環境在不變的場合，住在那里的有機體，組織也是不變的。

第二國際的其他一個理論家庫諾，也是支持着在社會發展中的地理環境的規定的任務。普列哈諾夫的「地理的偏向」也進到這個同樣的方向。這些一切所說的根本缺陷，都是無視下面那樣事實的結果。即是，社會現象只有從不能夠還原為一切自然法則的，物質的社會所固有的合法則性，才能夠說明。

史的唯物論，把社會的發展，作為被因果所制約着的一個自然史的過程來考察，由此排除了由神豫定的目的來說明歷史的進行，在人類的歷史中探求「被神祕化的意義」的這種非決定論（主張意志自由的僧侶學說）和一切種類的目的論學說。然而，否定目的論的，並沒有像布爾喬亞空論家們那樣曲解，說史的唯物論否定在歷史中的目的和觀念的動因。歷史的進行是什麼樣子都有的由人們追求各自的自己的目的而推進歷史，其結果，歷史被創造出來了。我們知道，這是恩格斯指示出來的地方。史的唯物論沒有否定目

的和觀念的衝動力，不用說是相反的，只有史的唯物論指示作爲一定的衝動而反映到行動者的頭腦中的歷史原因，」（恩格斯）因此，這些目的和動機才能給以正確的說明。史的唯物論是在各社會經濟的構成態中，來解明人類的大集團階級的目的和希望；指出它是怎樣的發生和構成爲什麼？它會在各種的形式中出現？從這些相對的目的衝突，歷史是怎麼樣才形成的？

老實說吧！否定究極目的和展望，才是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者們所固有的東西。相反的，史的唯物論，是以企圖開闢真正人類史的一新頁的偉大的理想目標的，全世界數百萬大衆的普羅列塔利亞和勤勞者獻身的鬥爭爲理論的基礎。史的唯物論，以各人和大衆獻身的英雄鬥爭爲基礎，但是相反的，布爾喬亞階級和他們科學所固有的東西，是像動物一樣以利己心爲基礎，是粗野的「廚房唯物論。」（薩魯茲哥夫·西查德林這樣說）

### 三 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

怎樣解釋社會發展的內在的合法則性？史的唯物論對於這樣的問題，也和布爾喬亞社會學是根本上不同的。布爾喬亞社會學以爲它們是永久不變的；探求在一切時代和民

族都是一樣有用的，最一般的法則就是它的任務。這種沒有具體歷史內容的一般法則是空虛的，無內容的圖式；連一個具體的歷史時代也不能夠說明的。史的唯物論與組成將生動的現實性嵌入公式的，一般的永久不變的法則之布爾喬亞社會學不同；它確定了社會發展的各歷史階段，即是各種社會經濟的構成態，只有由它所固有的特殊合法性才能給以它的特徵。一個構成態的發展法則和另個構成態的法則是不同的，後者是不能夠還原作前者的。然而，這也不能說史的唯物論是否定在人類之歷史中的一般法則的。我們知道，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論」中，是這樣指出了——「在這裡和在自然領域中完全同樣，由於發見諸現象的現實聯結，必要埋葬了人們所盲造出來的聯結。結局，這任務底歸結的地方，是發見作用於人類社會的歷史的一般運動法則。」可是史的唯物論和布爾喬亞社會學不同，它確定了歷史的一般法則，並不是對於一切歷史的時代都同樣有用的無內容的空虛圖式；而常常取着爲歷史所規定的，特殊的具體形式而出現。史的唯物論不是形而上學的把一般法則，從各種社會經濟構成態的特殊歷史法則中切離開來的。各構成態的特殊歷史法則，就是歷史一般法則中的特殊發現形式，可是一般法則也不能從特殊法則中獨立存在和作用。換言之，就是歷史的一般法則，在社會經濟構成態的特殊歷史發展法

則之外是不存在的，無論是怎麼樣的形態，都是表現着在一切社會構成態的發展中，所固有的一般的根本矛盾。例如：社會革命的法則，就是一切敵對社會經濟構成態的發生和交代的一般法則。社會革命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的敵對性格的表現；引起了舊構成態的變革和新構成態的創造；這時，這個過程，是在引起從一階級之手中過渡到他階級之手中的政權移動的，激烈的階級鬥爭中進行的。

社會革命法則的一般性格，對於人類的先史（原始狀態除外），史太林已經在集體農場的農民突擊隊第一回全聯邦大會的演說中敘述了。史太林對於這個問題是分爲三個階段來敘述的。撤毀奴隸所有者之制度的奴隸運動，撤毀封建制度之農奴的農民運動，在俄國就是掃除資本主義制度的十月革命。可是，在各構成態中，這個過程，只能在跟它固有的特殊形式中舉行；和其他構成態中的過程是原則上不同的。

惹起奴隸所有者制度之倒坏的奴隸運動，在原則上是和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及布爾喬亞革命不同的。「雖然奴隸蜂起革命，產生了暴動的革命運動，然而並沒有產生出指導的政黨鬥爭底意識的多數者，不能明白地理解向甚麼的目的前進，連最決定的歷史底瞬間，還是常常被操於支配階級之手的一個兵士。」比方西西里全土已成爲奴隸所佔領，同

時也波及到羅馬帝國底其他的場所的西西里奴隸戰爭（紀元前一三六——一三二年）或斯巴達卡斯的運動（紀元前七十年代）這些在古代羅馬也算爲強大的運動了；這是幾乎不知停止的奴隸底叛亂。然而奴隸之運動的特徵就是沒有現存秩序變革的綱領。通常，奴隸暴徒僅把暴動參加者從奴隸制度中解放出來，而奴隸制度本身還是在緩和的形態中被保存下來。我們知道，斯巴達卡斯的綱領，因爲要盡力避免直接的羅馬進軍，而把奴隸暴徒從意大利解放到他們的祖國普拉基亞和加里亞去了。所以在古代世界的階級鬭爭，不能算是政權直接的移動到奴隸之手（但是這是準備了向新興階級之封建諸侯階級的權力移動條件，）結果是兩相戰爭階級共倒而終了。

這樣，社會革命，差不多是人類先史之全體的一般的發展法則，可是在各種構成態中，都有着它固有的特殊特性。這同樣也可以說明關於史的唯物論的其他一切範疇。即是社會發展的一般法則，只有當作支配各個社會之經濟構成態的具體的特殊的合法則性才能存在。

爲布爾喬亞社會學特徵之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底形而上學的分離，在考茨基的場合是露骨的出現了。他在其著作「唯物史觀」中發展了這樣的見解。即是，在人類歷史中，

歷史的一般法則以及各個歷史的時代所固有的這個社會法則，都是同樣地作用着的。這樣，考茨基形而上學的把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切離了。這樣整理的結果，就歷史的聯結和從一個時代到其他時代的移行，社會經濟構成態的歷史發展及交替之一般的方向都會否定的。考茨基企圖證明社會革命之法則不是歷史的一般法則而不過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的移行的法則，這也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吧。這樣一來，喪失其內容一切資料的一般法則，都是由於考茨基把它化爲無內容，無對象的形式的圖式，是連一個歷史的時代也不能適用的。分離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的考茨基之流的特質，就在於他把「唯物」史觀的重點，移上實證主義的，個別的歷史時代的「特殊」法則的研究之上，使這些特殊法則從歷史的一般法則切離，在事實上也不能發見歷史之一般的合法則性和各構成態的特殊法則。

機械論者們在抽象的布爾喬亞社會學主義的精神中，構造出歷史外在的抽象的一般法則；把一個構成態之法則的作用，機械地擴張到其他的構成態之上。例如布哈林從均衡論出發，從事社會一般抽象的概念，而忽視了過渡期之特殊的合法則性。爲了資本主義，爲了過渡期，爲了社會主義，在他的場合至多也只能提出一個作爲一般的規制者的「勞



「價值法則轉化為勞動支出的法則過程，根本的社會規制者之偶像破壞的過程」中產生的。勞動支出的法則——無論是裸着體或穿上衣裳——它都是像經濟生活之命令的普遍規制者的樣子。只有這個法則的發見形式是變化了，然而其內容無論到什麼時候都是不變的。

反之，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們，一般的否定在歷史中的一般法則的存在和作用；使各個構成態之特殊法則，相互地被切離；以為僅發見喪失了一般的形式的法則就是史的唯物論的任務了。

於是，社會合法則性的問題，自然法則和社會法則之相關關係問題，歷史的一般法則與個別的歷史時代之特殊法則的關係問題，由於在史的唯物論中，完成了社會經濟構成態的概念，而得到解決了。馬克思給與包含着一切社會底一般的本質的特徵和其特殊的歷史形態的社會的定義。在論社會經濟構成態的學說中，歷史的一般法則，是在其特殊的形式中，在個別的社會經濟構成態之法則的形式中出現的。然而社會的合法則性的問題，只是一般地把它提出來，還是不能算做解決。史的唯物論不單僅發見某構成態（例如：資

本主義或封建制度的)底一般的合法則性。蓋因為純粹的社會經濟構成態在共產主義社會以外一般地沒有存在的。雖同樣的社會構成態也相應着各種的條件;在各國和各民族中,受着無限的多樣的變更和變形,而以它所固有的個性的特徵和特質而表現出來。例如:特殊的社會經濟構成態的封建主義,因為國家和時代不同,而有着種種變態和變種。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信中(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這樣主張:愛爾培以東諸國,是發現有特殊的特徵和特性的農奴制度底「復活」的時代。在這些國家中,因為十六世紀之農民革命的失敗,越惹起農奴的諸關係的保存及強化了。這個對於俄羅斯尤其是這樣。在俄羅斯許多的農民革命(一六〇五——一三年,一六四三——一五〇年,一六七〇——七五年,一七〇七年,一七七三——七五年)之失敗的結果,專制政治和農奴制度就更顯著的被強化了。像伊里奇所說:地主經濟的發展,歐羅巴之風不流行,而「舊中國風」,「土耳其風」,「農奴制風」流行了。

在一切國家中,資本主義之發生,發展及腐朽,都是依從着資本主義構成態中所固有的同樣的合法則性的。可是資本主義發達之一般的合法則性,因為在各國間相應於不同的條件,而就在特殊的,屢屢異例的,不能反復的具體的歷史的條件之下起作用了。例如伊

里奇追求在各國中的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而這樣地指出「農業在中世的形態改造，說起來就在德國是爲改革的實行……在英國……雖然革命的暴力的，但其暴力是對地主有利的……在美國……是暴力的去對付南部諸州的奴隸所有者的經濟。」對於俄羅斯，伊里奇確定了客觀的可能的布爾喬亞的發展底兩條道路——普魯西亞和亞美利加式的。俄羅斯進到保守主義，布爾喬亞型，其第一階段是一八六一年的改革第二階段就是斯多利賓主義了。在一九〇五——六年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農民革命，就是表示着農民在普羅列塔利亞的支持和操縱之下，要進入第二的亞美利加的發展之道路的鬪爭。成爲農民運動之經濟基礎的，這兩條道路的鬪爭，到一九一七年還沒有停止，最後才被普羅列塔利亞革命之勝利所揚止了。那時爲了農民，才開闢了社會主義之發展的新的道路。

最後，同構成態之發展的一般合法則性，也在其種種的發展階段中，受了各種的變更和變形而出現的。例如資本主義的構成態的一般合法則性，在其發展之帝國主義的階段中，是在幾分變更的形式之下出現的。伊里奇在其著作「帝國主義」中，這樣的指示，即是資本主義達到其發展的帝國主義階段，就越使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尖銳化，深刻化了，越

使資本主義之不均等的發展法則變更和尖銳化，而採取新的特殊的特徵因此重新提出普羅列塔利亞運動及在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性的問題。

因此，各構成態之一般的法則，不能僅停止在某個的構成態之一般法則的發見，而必須指出在各國和各民族中所取出的具體的形態。從這個見地看來，伊里奇對普列哈諾夫的鬪爭，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了。我們知道，普列哈諾夫無視了俄羅斯之資本主義發達的具體條件和特殊性，而從論資本主義發展之一般的命題出發，沒有充分地注意到資本主義發展之具體的進行，把俄羅斯的現實裝進歐羅巴之一般的模型。伊里奇在「火花派」時代批判普列哈諾夫的綱領草案時，特別是把他對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的問題之輕視和曖昧，視爲他的根本缺陷之一。伊里奇指示出俄羅斯資本主義發展之具體的特殊性；而且在具體的現實性之具體的估計上建立了自己的戰術。

這樣說起來，在純粹的姿態中，所採用了某構成態之一般的合法則性，是必定適應於多種多樣的具體的條件和事情，而受到無限多樣的變形與變態的。這個意義，馬克思已在「資本論」中也這樣寫過——「雖是同一的——從主要的條件看來是同一的——經濟基礎，也爲了無限的不同的經驗事情，自然條件和人種關係，外部作用之歷史的影響等

等，那麼當現實出現的時候，就暴露了無限的變更和色調；這個複雜的關係只有籍以上之經驗所給與的事情的分析，才有理解的可能。」研究同一構成態之一般發展法則的這些變樣的變形，是爲了正確地認識歷史，爲了採取基礎於其上之行動的必然的重要條件。爲了這些無限的多種多樣的事情，「所有的一般法則只有在非常錯綜的近似的姿態中作爲支配的傾向才能實現。」

## 第五章 當作社會科學與實踐的行動方法的史的

### 唯物論

#### 一 史的唯物論與其他社會科學

史的唯物論是反映社會經濟機構的發展及交替底合法則性的社會發展之一般理論，同時對於一切社會的歷史的個別科學，它又表現為唯一的科學方法，它是「社會科學的方法論」（伊里奇）是「說明歷史之唯一科學方法」的理論。史的唯物論之根本範疇是反映社會發展之客觀的辯證法，同時又表現為指導具體的歷史材料之研究底方法論原理。史的唯物論之方法論的意義，首先是在把生產關係，當作一切社會關係的實在基礎；社會的歷史的分析底出發點。

「從來，社會學者們，在社會現象複雜的綱目中，都苦於區別重要的現象和不重要的現象，爲了有這個區分，他們不能發見出客觀的標準了。唯物論抽出「生產關係」作爲社

會構造的基礎；同時把能夠適用於社會學的，而又被主觀主義者們所否定了的那個反覆性底一般科學的規準，給它以能夠應用於這生產關係的可能性，由此完全提供了客觀的規準……物質的社會關係底分析是着眼於反覆性和正規性，把各國的秩序，給與可概括爲所謂「社會的構成態」的一個根本概念的可能性。

那末，史的唯物論底一般的方法論的意義，是在這一點上：首先把它當作社會的分析底出發點，同時一切社會科學，必定要抽出社會的經濟構造，作爲一切社會現象底究極規定的要因。可是，在敵對的機構中，生產關係是視爲諸階級之關係。一切人類的歷史，差不多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因此，可以這樣看：史的唯物論也是以階級鬥爭的理論，去說明原始的共產主義解體以後人類的全史的，根本指導原理。伊里奇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在外見上的迷宮和混沌（歷史的——阿丹米雅諾夫）之中，能夠給與我們發見合法則性的系統的，這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不僅是說明社會現象，即是在改造和變革社會的場合，也應該從這理論出發。

只有從社會發展之科學理論的，同時當作社會現象研究底方法的，史的唯物論之正確的理解出發，才能夠解決史的唯物論和其他社會科學關係的問題。如經濟學，法律學，國

家學、言語學等等的社會科學與史的唯物論的區別，首先是這一切的科學只是研究社會的運動之各種側面或形態，而缺乏研究整個的發展。要是以生產關係爲研究對象物時（經濟學），自然也有研究各種上層構造（法律、國家、藝術、言語等等）的必要。而且這些上層構造，雖有着其發展的相對的合法則性，但同時是作爲在社會的全體內部中的個別的運動形態，而從屬於社會的一般的合法則性。然而作爲史的唯物論之對象者，既不是社會的各個側面，或其個別的運動形態，更不是獨一的機構，而是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社會經濟機構的發展及交替的一般的合法則性。

## 二 史的唯物論與歷史之關係

在史的唯物論和歷史之間，存在着若干不同的關係。歷史科學的任務，是研究人類具體的進行；研究各種民族和國家的歷史發展的合法則性。『歷史屢屢是描寫飛躍的電光形而執筆。於是在這場合，不僅取得許多的重要性的難得的材料，而且必須到處追求思想的進行屢次受到中斷的原因。』然而，當作科學的，或歷史過程底一般的理論的史的唯物論，是捨象一切歷史的偶然性和曲折的變化，作成社會的發展的一般的理論——不消說，



是反映歷史的進行，反映『奪去其歷史的形態和亂雜的偶然性』的進行。就是說，史的唯物論，是把社會發展根本的本質的階段，形態和其法則普遍化了。具體的歷史，其任務是在其一切特殊性中，順着年代指示出是何種構成態的歷史的發展，隨着其個性的性格，多數的變更及偏差，而發見在一定的國家和一定的時代中的，固有的具體的合法則性。可是，科學的史的唯物論，和這個具體的歷史不同，它創造出社會經濟的構成態的發展及交替的一般的理論。然而，從這個見地看時，就在史的唯物論和歷史之間，又有着極其密接不可分的交相作用和聯結。史的唯物論的結論，是完全立腳於具體的歷史材料，是歷史的認識全體的一般結論，結果，及最高的總和。使史的唯物論和歷史分離，而抽象的考察其範疇，必然的成爲觀念論和煩瑣哲學，以至使理論自實踐中割離出來。反之，當作科學的歷史，一定要完全立腳於史的唯物論的一般方法論的命題。就是說，史的唯物論底一般命題，是辨別綜錯，複雜的歷史事實，區別本質的與非本質的東西，理解各個歷史事實的相互聯結與依存關係，創造出歷史發展的綜合見解，是應該與歷史家以這個規準和可能性的。

史的唯物論之一般命題，只有爲了研究歷史，而作爲方法論來提起，才能有用，不能以具體的歷史研究去代替它的。又所謂「社會學化」就是以一般的「社會學的」圖式代

替具體的分析，這是一方面廢棄科學的歷史特質，他方面是在布爾喬亞社會學主義和圖式主義的精神中，歪曲史的唯物論。

對於史的唯物論和所謂「歷史哲學」的關係，這裏首先應加以注意的，就是所謂「歷史哲學」是從一定的理論概念和理想的實現，或絕對精神發展之實現的視角來眺望歷史，以解明人類史的目的和意義為任務，它是和史的唯物論立在相反的立場，而否定科學的史的唯物論的。所謂「歷史哲學」的用語，若將其應用於史的唯物論時，就會使「歷史哲學」和史的唯物論的原則界限曖昧了。因前者是講求各種形而上學的，「超歷史的」先天的圖式的，觀念論東西。同樣的理由，要是將「社會學」的用語轉用於史的唯物論上，是必要很多的條件的。第一，因為很多人是沒有注意到史的唯物論的根本特徵和布爾喬亞社會學的觀念論是有着不同方向的——在社會科學上的唯物論方向。第二，在布哈林的場合，把這用語擴大到史的唯物論之上時，就把布爾喬亞社會學抽象的規定和概念轉用到史的唯物論的領域去。因此在和布哈林論戰之際，伊里奇給布哈林的著書「過渡期的經濟」的註評中，却把這用語括入括弧之中了。

關於史的唯物論的對象問題，不能不預先舉出曾在蘇聯發現過的兩個特徵的修正

形態。機械論者們，在考察史的唯物論的時候，把它當作是論及抽象的不變的社會及「均衡」法則的「一般的」學說；同時當作最「一般的（抽象的）」社會科學（布哈林）來考察，這末，當布哈林說明史的唯物論的時候，已經放棄了其最本質的標幟——關於社會經濟的構成態的學說。因此，在布哈林的場合，史的唯物論變成「社會一般」的抽象圖式，變成失去了具體的特殊性的一切多樣性的抽象前提的總體；在各種各樣的歷史時代，都能夠一樣機械的適用的一定的圖式化了（例如：對資本主義之合法則性的過渡期底機械的轉用，「勞動支出之法則」的普遍化等等。）

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們，以為制作我們研究歷史時之助手的前提的，是史的唯物論的任務。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們，將方法從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中分離出來，由此，史的唯物論化成形式的前提底體系來用於研究實在的歷史過程的。少數派的觀念論者之某一部份人，雖然反對布哈林之流的抽象的「社會學主義」，可是却主張：使歷史的特殊法則和一般法則形而上學的對立，而歷史的一般合法則性不能當作問題；史的唯物論的任務，只是研究各個社會經濟的構成態之特殊法則。

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們，實在是將史的唯物論化做混沌的歷史材料帶來秩序的，先天

的諸條件的總體。於是，在他們對史的唯物論的對象和其任務的說明中，可以現出他們將史的唯物論用黑格爾式的修正，同時在某程度內更受里喀爾特主義的影響。蓋史的唯物論，是由他們之手把它還原於背離實際的，具體的歷史過程之歷史的先天的論理學了的緣故。史的唯物論，雖是研究社會現象的方法，雖其所以成爲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者，是因爲它同時又是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所以把方法從理論中分離出來，必然會引起馬——伊主義底方法的解釋之歪曲，把這個方法化爲在表面上被具體的歷史材料所適用的抽象前提（僅可以說對於人的認識力有其根據）的總體。

### 三 當作實踐的行動之方法的史的唯物論

史的唯物論是社會發展的科學理論，同時是歷史的認識之一般的方法論；又是社會的變革和實踐的改造之唯一的科學的理論。它是基於社會發展之歷史的進行及其內在的合法則性的唯一正確的反映，來指出資本主義機構固有的內在矛盾，和這矛盾日趨於尖銳化；同時指出以這矛盾爲基礎的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陷於崩潰，及趨向於新社會的階段。史的唯物論就是爲此而提供出來的武器。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是在史的唯物論中

找出其直接的理論基礎。史的唯物論，科學的證明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崩潰，這社會要推移到更高級的發展階段；同時又指示出推動這社會的方法，闡明為新社會建設者的勞動階級之歷史的使命。史的唯物論，是以馬——伊主義的根本命題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的崩潰和新社會的創造，不是作為自然發生的，自主的自動的過程；而是當作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經過長時間之鬪爭底結果所產生出來的。

所以，史的唯物論是勞動階級實踐的指針。同樣的，史的唯物論是嚴正的黨派科學。但如上面所述的一樣，這黨派性不是基於主觀主義（這是布爾喬亞科學的附屬物），而是基於徹底的研究歷史現實性的客觀主義。因為史的唯物論的黨派性，是徹底的科學的客觀主義；是以決不是布爾喬亞和修正主義的意識形態者們想要證明的一樣，說它是和客觀主義相矛盾的東西。伊里奇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中，極深刻簡潔地將史的唯物論的黨派性的原理給與定式化：「人類最高的任務，是在一般的根本特徵去認識經濟進化（社會存在的進化）的這個客觀的論理，使人類社會的意識和一切資本主義諸國前衛階級的意識，儘可能地明瞭的批判的適應它。」在這公式中，一方面以古典的明確強調了史的唯物論之最高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他方面也同樣地強調了立脚於客觀性之史的

唯物論之黨派性，和關於社會發展之理論的行動性和創造性。

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代表他們前衛的），一方面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之客觀的論理及階級鬭爭之客觀的進展；而他方面自己又成爲一個行動的力量，成爲社會發展之主觀的要因。所以，史的唯物論的黨派性，是與布爾喬亞的黨派性異其形態的，對主觀主義，布爾喬亞的客觀主義，都加以相等的駁斥。史的唯物論之黨派性的原理，和主觀主義（托羅斯基之社會現象觀的特徵）不同之點，是因爲他從社會發展之客觀的論理本身出發，從具體的現實性之具體的計算中，找出嚴正的科學結論的緣故。同時它又和帶有自然放任理論（右翼機會主義的特徵）的自生的客觀主義，以及布爾喬亞科學的假裝公平無私和中性性的不同之點，是因爲它不使階級和政黨分離，不抹殺生動的現實或使其不具化，不似支配階級所歡喜的那樣，在「客觀主義」的旗幟下歪曲社會發展之現實的進行。

一八八四年，伊里奇又在反駁斯特魯勃的著作中，對於所謂「客觀主義」曾加予致命的批判：「客觀主義者僅說及某一歷史過程中的必然性，而唯物論者却能正確地認識一定的社會經濟之機構和由此發生的諸敵對關係。客觀主義者因證明一定的事實系列

之必然性，所以始終陷於爲這些事實之辯護者的見地；而唯物論者却暴露階級對立，由此而規定自己的見地……故唯物論者是最徹底的客觀主義者，而自己又更深刻的，更完全的貫通了客觀主義。」它表明「究竟什麼階級規定這必然性，」從而指示「唯物論是含有黨派性的，對於每事物的評價，都依從端正的公然的站在特定的社會集團的見地。」

這麼，黨派性的原理，其最深的根基是生動的，發展着的現實性本身；是由於勞動的前衛，科學的普遍化這現實性之客觀的進行。認識這個結節點，以現實性全體的根本改造爲目的，在這結節點上加以批判的工作。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對史的唯物論之黨派性的原理，大加以攻擊，例如：考茨基主張史的唯物論本身是無黨派的，馬克·亞多拉拒絕把史的唯物論和政治及黨派的鬥爭結合，夫利多利希·亞多拉又在一九一〇年，主張擁護俄國的馬赫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非難伊里奇及其他的人們，說他們把世界觀的問題認做黨派的問題。但是，這只是假裝的理論底公平無私（是他們的說教，）是企圖蒙蔽布爾喬亞黨派性的形態，而完全對馬——伊主義攻擊。在蘇聯，史的唯物論的黨派性的原理，被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和機械論者修正了。少數派的觀念論者們，復活第二國際最壞的獨斷說——理論與實踐分離——由實踐走入純粹理論的領域，使理論本身化爲失去了具

體歷史內容的概念，無內容的煩瑣的遊戲了。在少數派的觀念論和魯濱主義的場合，從普羅列塔利亞的實踐，轉向純粹理論的煩瑣哲學的領域的這個「退却」是和反革命的托羅斯基主義及少數派的觀念主義的政治勾結。

機械論者們，高唱右翼機會主義的自然放任論，和對自然生長性屈服的理論，以及過少評價在運動中的意識要素之作用；沒有知道理論的實踐意義，宣傳「尾巴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實踐從批判的理論中分離，使實踐本身成爲狹隘的實利主義。關於理論和實踐之相互關係及理論的黨派性的古典規定，史太林在其著作「伊里奇主義的基礎」中會論及：「理論是萬國勞動運動的總計。不消說，理論要是不和批判的實踐相結合着，那它便會成爲空虛的東西；同樣地，實踐要是沒有批判的理論去指導，那便成爲盲動的。但是理論要是在和批判的實踐之不可分的聯結中形成的，它便是勞動運動中最大的力量。爲什麼只有理論才能幫助實踐，就是因爲理論不僅使我們理解現存階級要向怎樣或到那裏移動，而且使我們理解最近的將來它必定跑到怎樣的一個階段上面去。」



空白页

## 第六章 構成態 生產樣式 制度

### 一 社會的經濟構成態底規定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見了的社會經濟構成態之學說，是史的唯物論的基石。「恰如達爾文更正了以動植物的種子看做是不受任何東西拘束的，偶然的，「神創造的」永久不變的東西的見解，而確定種子的可變性和相互的繼承性，將生物學完全置於科將的基礎一樣；馬克思也更正了，以社會看做是依支配者的意志（或稱爲社會和政府的意志）而起變化，爲偶然的發生變化着的個人的機械集合體的見解；而確定當作一定的生產關係之總體看的社會的經濟機構底概念，同時確定這機構之發展是一個自然史的過程，從此把社會學置於科學的基礎上。」構成態的學說，能夠適用社會學上的反復性的規準，把人類史的全體作爲社會經濟的機構底發展及交替的自然史的過程來考察。在這場合，各個的構成態對於先行的構成態來說，都算是「社會的構造之前進的時代」（馬克思）。

規定各種社會經濟的構成態之基礎物，是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這構成態上固有的生產關係的總體。馬克思在「賃銀勞動和資本」中，如次地指明了：「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不僅和自然發生關係，而且人們也互相發生關係；爲着共同勞動，若不用一定的方法來結合，就不能生產。」爲着生產——馬克思這樣寫着——人們才加入特定的聯結和關係中，而且只有通過這些社會的聯結和關係，才發生人類對自然的作用，才能進行生產。「這生產的担当者，和自然發生着關係，而且相互結合着的這些關係的總和——他們在其下面生產的關係總和——就是從經濟的構造中發現出來的社會。」

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的序文中，敘述了社會歷史的理論之基礎觀念：「人類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中，要加入照應着他們的物質生產力底特定之發展階段的生產關係——不是依照着某種特定的，必然的，他們底自由的意志的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在這實在的基礎上，建立起法律的及政治的上部構造，而特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也跟它照應着。」

被政治法制的形態和社會思想底一定潮流所纏繞着的，各種生產關係體系，形成特殊的社會經濟機構，特定的社會之有機體；而有着「其自身的發生和機能，及向更·高·級·之

形態的推移向其他社會的有機體轉化的特殊法則」那末，史的唯物論中所謂社會經濟構成體者，是指在人類社會發展之特殊的歷史階段，社會存在的特殊形態；同時它其間有着它所固有的合法則性，創造一定社會形態的內在聯結，而且含有究極規定一切社會的過程和現象的，特殊的經濟構造。一切的構成態，是經濟的基礎和上部構造之具體的統一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的指出「一切資本主義的社會構成態，都有它自身的側面，就是在生產關係中，帶着其固有階級敵對底事實的社會發現，帶着維持資本家階級底支配的布爾喬亞之政治上部構造，和自由平等等之布爾喬亞的觀念，以及布爾喬亞的家族關係的……活生生的構成態。」

## 一一 生產樣式

各個社會的構成態的質的規定性，其合法則發展的基礎，是存在於人類物質的社會生產活動或勞動活動之中的。如野蠻人爲着滿足自己的慾望，維持自己生活的再生產的緣故，就不得不和自然鬥爭一樣；文明人也必須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樣式下，和自然鬥爭。」勞動是將人類社會從其他一切自然界區別出來的。當作在自然和社

會之間所發生的過程的勞働——人類依照自己的行動，而意識的，合目的的制約，統制自己 and 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的過程——是人類專有的特質。人類的勞働活動，是在一切社會形態中的人類生存共通的條件；是永遠的自然的必然的事實。史的唯物論和將社會的全體基礎底終極求諸個人的屬性中的，布爾喬亞的社會學底原子論的表象不同，它是在人類社會的勞働活動中探求社會全體之最深的基礎的。若依恩格斯底適切深刻的話來表現，就是說「勞働創造了人類自身。」人類的勞働和動物的「勞働形式」有着質的不同。人類的勞働是帶着社會的性質，基於意識的計劃行爲，而以意識的能動的改造外的環境爲基礎，必然的有人爲的生產工具使用；反之，只企圖維持自己生存的動物活動，是基於動物的本能反應，而以亂暴的使用外的自然（只爲臨時的措置）爲基礎，雖不應用製造了的生產手段，也能夠從事。因之，在動物界，也不會有過什麼真正意義的勞働。若借恩格斯的話來說，就是勞働過程是在工具製造出來的時候，才開始的。

不理勞働過程是在什麼社會形態發生的，而馬克思準備考察勞働過程時，就區別出如下的勞働過程的單純要素：（一）合目的的活動或勞働；（二）勞働活動的對象；（三）幫助勞働的工具。一方面爲勞働力本身，他方面爲生產手段（即勞働工具和勞働對象。）這是

一切生產過程之必然的要因。在勞動過程中的兩者統一或結合，構成了物質的生產力。不論勞動過程以怎樣的形態進行，勞動力量都是一切勞動過程底單純的要素；勞動者和生產手段，是其必然的要因及條件。

可是在一般形式中所考察了的勞動過程勞動本身是一個抽象。然而這個抽象，只要是經過勞動歷史之發展階段的全體，而確定勞動固有的一般特徵，那末它就是有科學內容的抽象了。在所謂生產的場合，始終是指在社會發展的特定階段的生產，這是馬克思特別強調了的地方。

然則，在社會發展的各種階段底人類生產活動之歷史的規定性，是以什麼為特徵呢？馬克思給「資本論」第二卷裏頭，對於這個問題給與了古典的解答：「生產的社會形態，雖然什麼樣都有，可是，勞動者和生產手段始終是生產的要因。但在其互相分離的狀態時，就無論那一個都不過是可能的生產要因。爲着要進行生產，兩者務必結合起來。依這結合而發生的特殊性質和樣式，就可區別出社會構造底各個經濟時代。」

這樣，各個社會的構成態，只有由它所固有的直接的生產者和生產手段結合底特別性質及樣式，以及跟它照應着的生產力，在其內部作用的特殊形式的生產關係，換言之，就

是只有由特殊的生產樣式才能給它以特徵。生產樣式是一切社會的發展及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宗教、家族、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這些不過是生產底特殊的形式，從屬於生產底一般的法則的。」雖說它是一個社會現象，然若離開社會的物質基礎，及生產樣式的關係，則不能夠理解和說明了。當作生產力之根本要素（勞働力和生產手段）的社會結合底形式的生產樣式，它不是技術的範疇，而是一個社會底形式，其中不但包含着技術的過程，而且也有着物質生活底直接的生產過程。在生產樣式中，表現着經濟的聯結和技術的方法之不可分的統一。從生產樣式出發，則其餘的一切經濟諸關係，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等的關係，就是整個社會的經濟構造都能夠說明的。馬克思給安涅哥夫的信也以同樣的意義如次地寫着：「人類隨着獲得新的生產力，而變更他們自己的生產樣式；隨着生產樣式的變更，也變更了不過是特定生產樣式的必然關係底一切經濟關係。」

各生產樣式，是由表現直接生產者對生產手段的關係的，固有的所有形式，而給它以特徵的。例如：古代的生產樣式，以奴隸的榨取為基礎，而且奴隸和生產手段（土地、勞働工具及其他）都是奴隸主的私有物。封建的生產樣式，其特徵是：土地（生產的基本條件）是從被領主的所有地拘束着的直接生產者的農民分離開來的特定的生產樣式的單純

商品經濟，其特徵是生產手段歸直接生產者私有，而不從生產者分離出來。單純商品經濟，不是單一的構成態。在生產手段的私有這一點上，雖屬和資本主義底生產樣式同一類型，但不是和資本主義底生產樣式同樣的東西。蓋因為私有財產，在單純商品經濟中，是基於自己的勞動，不以榨取他人的勞動為基礎的緣故。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其特徵是使自由勞動者從生產手段中分離出來，而用資本家之手來使兩者結合的。反之，社會主義的生產樣式，其特徵首在不使生產手段從生產者分離出來，而為生產者自己的社會所有。他們共同利用，計劃的組織的管理。

這末，在敵對的構成態中，生產樣式是以帶着階級的性質，特殊的，固有的勞動榨取為特徵。「不支給的剩餘勞動，從直接生產者榨取來的特殊經濟形態，是决定着支配和從屬的關係；可是這個關係，是由生產本身直接的發生，更對於生產發生決定的反作用。以此為基礎，而建立從生產關係本身產生出來的經濟構造，同時建立社會特殊的經濟構造。生產條件所有者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關係底所有的一定形態，每次都照應着自然的勞動樣式之特定的發展階段，從而又照應着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就是在這點上，我們始終可以發見：隱藏於一切社會制度的，從而又是主權和從屬底關係之政治形式



的，要之，所有的一定特殊國家形態的，最深的祕密底基礎。」於是，在敵對的構成態中，以一定的構成態底生產樣式作它特徵的生產關係，爲其基礎相類似的東西，是直接生產者對生產手段之所有者的關係。所謂階段鬭爭，是在一定的生產樣式中，發見出來了的固有的敵對矛盾。於是在直接的生產過程中所構成的關係，同時也作爲階段關係而表現。

波格達諾夫基於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在分析階級社會之際，無視其階級的性質，把生產關係區別爲二個基本類型——直接生產的關係和所有（階級）關係。布哈林也仿倣着他一樣，分生產關係爲「社會的階級」關係和「技術的勞動」關係，使這關係，機械的相互分離和對立起來，而從所謂「技術的勞動」關係中除去其社會的內容。布哈林不理解在階級社會中，同時不能夠存在着沒有階級性的「技術的勞動」關係。又如布哈林的「能夠組織起來的資本主義」理論以及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可以計劃的組織勞動和社會生產等的思想都是由以上的抽象的，超階級的直接生產過程底解釋而來的。伊里奇在他對於布哈林的著作「過渡期的經濟」底註評中，如下的指明着：「所謂「社會的體系」「社會的構成態」的表現，若沒有階級及階級鬭爭的概念，就不是充分的，具體的。」階級鬭爭，如後面所說的一樣，是作爲敵對的社會構成態底發生之根本的合法性

而表現敵對的社會構成態，只有依照馬克思主義底階級鬭爭的理論，才能夠理解和說明。馬克思——伊主義的古典家們，從生產樣式出發，區別出如次的五個社會的經濟構成態：原始共產的構成態，古代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封建的構成態，資本主義的構成態，社會主義的構成態。古代的，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構成態，和先階級的（原始共產的）構成態及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構成態不同，它是階級的敵對構成態。

### 三一 原始共產的構成態

最初期的，「古風的」（馬克思）構成態，是發生在數萬年間繼續下來的第三紀和第四紀之交界線上。人類社會，是經過長期只食天然物底動物本能的活動形態之變形過程的結果，在以人爲的製造勞動工具爲其本質的標幟底人類勞動活動之中，已經爲類人猿羣所構成了。勞動創造人類，把人類從動物界分開。先階級的構成態，在其發展過程中，通過如次的主要階段。1，先氏族社會，2，母權制氏族，3，家長制氏族。作爲從家長制氏族至階級社會底過渡階段的，是村落共同態。在由原始共產主義直接轉移至封建主義的國家中，村落共同態，則作爲原始共產主義制度在封建的構成態中的長期間的保存（如俄國的

「米爾，」德國的「馬克，」印度的共同態及其他等是。）存在於原始共產構成態底一切階段的基礎，雖受着種種的變形和變更，然而它是「勞働力和生產手段底本源的統一」（馬克思，）這個統一。是原始共產主義生產樣式的特徵。極端低下的生產力之發達程度，及個人力量的弱小，限制了生產集合的性質，限制了當作古風的生產關係形式的結婚家族關係，和氏族的結合之顯著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的創始者們，對於「血緣的」即肉親的親族關係，給與特殊的意義，這是因為它在這關係的範圍內，能夠生產物質的生活資料，推進「古風的」構成態底生產力發展的緣故。「血緣」關係的各種形態（血族家族，集團婚之各種形態，家長制氏族，家族共同態等等，）是原始社會的最初經濟單位，同時又作為經濟活動之形態而出現。恩格斯也以同樣的意義，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序文中，如次的寫着有名的史的唯物論的定式：「依唯物論的解釋，在歷史之最後的決定要因，是直接的生活生產及再生產。然這又是與其本身不同的東西。一方面是生產資料，即衣食住對象的生產和其必要的工具生產；他方面是人類自己的生產，種族的繁殖。特定的歷史時代及一定國土的人們，在其下面生活的社會秩序，是由二種類的生產，來限制着。即一方面。是勞働的，他方面是家族的發達階段。勞働的發達，越是幼稚，即勞働生產

物的量，又可說是私社會的財富，越是被限定着，則只有這個血族關係，在社會制度生，發生許多支配的影響。」

在右面所引用了的恩格斯的定式，再三的遭受了布爾喬亞社會學者們，和各種類的修正主義者的批評和歪曲。非難恩格斯是從一元論史觀脫落了，是「二元論」者，即是說他從各種要因（在終極中的經濟和血族關係）來說明歷史的發展。密海洛夫斯基，反對恩格斯，而主張了「生殖爲經濟外在的要因。」伊里奇在「誰是人民之友」中，對於這種反對論——不理解生殖關係在原始社會中，同時作爲「物質的生產關係」，即是作爲生產關係之具體形式而出現的恩格斯的深刻意義的反對論——曾經給與徹底的答案。換言之，血族集團（不論它以怎樣的形式來表現，）是生產的有機體，同時，在這有機體的內部，集團的勞働形態，集團的所有及集團的分配，都在某種程度進行着。

原始共產主義的諸關係，在母權氏族時代，已達到了最高度的繁榮。非常徐緩地發達了的生產力，因爲達到一定的發達程度，氏族組織和其聯合在其內部成長着的各種形態便成爲其更向上發達的桎梏了。氏族組織，已經「對於使勞働作爲社會的勞働而發達，使社會勞働的生產性發達沒有效用了。於是，在勞働和所有之間的區別，分離和對立便成爲

必要。」原始共產主義的這崩潰過程，隨着家長氏族的時代開始。那時，各個家族共同態的勢力也增大，所以它經營獨立經濟，與氏族的集團經濟愈發對立了。以此為基礎，對於生產手段的私有是發展強化了，在各個家族共同態之間，財產的不平等也深化起來，同一氏族內部底本源的「利益統一」變成爲「氏族成員間的對立」（馬克思）給與氏族其後的財產分化，許多家族從氏族名門的分出，氏族制度的崩潰以有力的影響的，是在那時代發達了的家長奴隸制。同時，又是劃分階級社會最初的大分裂。新發達了的社會階級底衝突，「使建築在氏族結合上的舊社會破裂了。」（恩格斯）

這是最初的社會革命，它使原始社會瓦解，而確立了最初的階級及支配階級的政治組織的國家。代替了原始共產主義，而出現了怎樣的構成呢？——這是要看各國之具體的歷史發達條件而定的。例如：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時代，因爲貨幣經濟的普及，商業及商品生產發達的結果，所以代替氏族社會而出現的，是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古代希臘的沿岸貿易地帶（雅典、哥林托、米黎托斯），雖是從氏族制度直接轉移至奴隸制度；但在希臘經濟落後的地方（愛他利亞、愛比爾、羅古利達），至紀元前四世紀，還保存着氏族制度；而在斯巴達和鐵沙古亞則發達了農奴的關係。其他，在許多的民族（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和加

爾特等等)間,代替氏族制度而出現的,是封建的構成態。家長的奴隸制,固可說它的原始共同態的崩潰,和農奴關係的形成,完成了顯著的任務,但在這些民族間,都沒有長成到了奴隸所有者的體系。

#### 四 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

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是以「古風的」構成態的崩潰爲基礎,從已經存在於原始社會之最後階段的家長奴隸制發達出來的。這個構成態,是在古代世界(希臘和羅馬)中,古典的實現。這裏,奴隸制完成最高度的發達,無論在農業(大私有地)或工業(奴隸的製造業,手工業)中,以及在家庭生物中,它都支配了生產樣式的一切。在古代希臘的氏族制度的崩潰過程,已經開始了「英雄時代」;但它最後爆發的時候,是紀元前七——六世紀的事情。當時,以紀元前五九四年,梭倫革命爲發端,五〇九年古利斯丁的革命爲終結的一貫的政治革命,終於傾覆氏族之土地貴族的支配;同時,也一掃了氏族制度最後的殘滓,而確立了奴隸所有者的制度。它是從崩潰過程中的氏族胚胎內所形成的,從諸階級間長期苦鬥過程中所生長出來新的構成態而在古代羅馬,氏族制度的崩潰和新奴隸所有

者的構成態之發生，也是平民和貴族經過長期間鬭爭之結果（紀元前五——四世紀。）  
奴隸制比較氏族制度，雖是最初的進歩底構成態，但它達到一定的發達階段時（阿岳術  
斯時代以來，特別是自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以來，）對於大土地所有也失其效用，因此，其  
餘命也就告終了。以奴隸勞動爲基礎的大私有地的經濟，得不到利益，而小經濟就成爲  
「唯一合算的形態」（馬克思。）大經濟雖是在小地面上發達出來的；可是，這個小地面，  
根本是交給被土地所結合的農奴，而且農奴對土地的所有者，每年要繳納一定額的租金。  
於是，奴隸制成爲非生產的，使大土地所有者轉移至農奴制度。

然農奴制度的發達，固可說奴隸制已經死滅了，但還沒有表示着封建主義的誕生。雖  
然生產力已經停止發達了，可是自由勞動「還未能成爲社會生產的基礎形態。能從這個  
狀態發生出來的東西，只是完全的革命」（恩格斯。）由此觀之，成爲古代社會根本的發  
動力的，是奴隸對奴隸主的戰爭。這戰爭，差不多不間斷的埋遍了羅馬的全史。如最初的西  
西里暴動和斯巴達克斯運動等強有力的運動，皆是由此發展出來的。奴隸的叛亂，是德莫  
克拉西運動（小土地所有者，都市德莫克拉西和奴隸大所有者大門爭）和野蠻人對羅  
馬的鬭爭之連合結局，使奴隸所有者的支配階級，更加轉移至森嚴的國家獨裁形態（三

頭政治帝國了。當作「過渡勞動的公認形態」的「虐殺奴婢的強制勞動（馬克思）除了使小農更加零落，使他們奴隸化，毀滅帝國邊陲的氏族財產，對野蠻人更加發動掠奪戰爭以外，不知道有其他強化榨取的方法。所以，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地所有者的鬥爭，也應該把它當作從古代世界之根本矛盾——奴隸和奴隸主之矛盾——所派生出來的鬥爭來考察。不錯，在古代史的各個時代中，古代世界之主要矛盾裏的這些派生的形態正面的顯現，雖曾對事件的進行發生過決定的影響，但它並沒有意味着古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表該求諸奴隸所有者的財產，和基於零細生產的個人財產間的對立；或羅馬的沒落是應該從被野蠻人的征服來說明。大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鬭爭形態；野蠻人的征服羅馬，這些都只有從古代世界主要矛盾的奴隸和奴隸主間的矛盾出發，才可以說明的。若依照史太林適功的話說來，就是「奴隸的革命，將奴隸所有者一掃，廢止了奴隸所有者榨取奴隸的形態。」這個革命，雖以互相戰爭的階級之共倒而終結，可是在世界的廢墟之上，「在新文明的生產煩悶中」（恩格斯）最後，創造了代替古代世界的封建構成態的新的社會階級形成的一切前提。



## 五 封建的構成態

封建構成態的特徵，是主要的生產手段——土地——成爲大土地所有者所有直接生產者——農民——要受土地的牽累，雖有生產工具而沒有土地。封建的榨取，是立脚於經濟外的強制，以農民對地主之個人的從屬關係，農民受土地的拘束爲基礎的。封建主義，要是和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比較時，它是一個進步的體系。蓋因爲直接生產者，不是完全失掉勞動生產性發達之刺戟的緣故。封建的所有制度，一方對零細經營者提供了使生產力發達到某程度的可能性。但同時又成爲小經濟自由發達的根本障害。這末，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矛盾，就作爲農民的零細經營和封建的所有的矛盾而出現，這個矛盾，奪取了小農經濟自由發達的餘地。

這根本矛盾的發展，是表現封建生產關係的，先資本主義的地租的進化而出現。最初的地租形態，是勞役地租，它是完全以自然經濟爲基礎的。第二的地租形態，是現物地租，它以農民勞動較高度的發展階段爲前提，爲了得到過剩的勞動時間，它對農民提供更多的餘地。這種地租，是和從來一樣以自然經濟爲前提，卽是以經營條件的全部，或大部分在

經濟範圍的內部所生產的爲前提。」不消說，生產的自然性質，不排除商業和交換，但在這一個生產形態中，還沒有商品生產的存在。要之，只有商品流通在這里進行着。」只有現物地租轉化到第三地租形態——表示先資本主義之地租的崩潰形態的貨幣地租——才「以生產物之市場價格爲前提，以生產物的一定價格買賣爲前提。這是從前的形態所沒有的。」同時在農業中創造出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的前提。在現物地租的支配時代已經發生了的，「各個直接生產者的經濟地之差別，」貨幣形態之下，成爲在農村中之階級的階層基礎。所以，小生產從封建的構成態初發生時，就是單純商品生產了（固可說爲在萌芽的形態，）但以爲封建構成態的根本矛盾，是存在於封建的所有與當爲商品生產之萌芽形態的小經濟之矛盾中，這樣的意見，是根本錯誤的。伊里奇把被資本主義經濟區別出來的農奴經濟底根本特徵之一，首先在被貨幣的資本主義生產區別出來的封建生產之自然性質中發見出來。小生產，當達到了一定發達階段時，就使封建的所有和零細地經濟之間的封建構成態根本矛盾深刻化，同時又開始商品生產。這個根本矛盾，表現農民對封建領主的鬪爭，這個鬪爭又是封建構成態發展的發動力。它和反封建的都市運動密切地連結着，經過一貫的革命，才傾覆農奴的秩序，而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

封建構成態的發達形態，在中世紀已經存在了。在西歐封建的秩序是發生於羅馬帝國（農奴關係）和古代日耳曼種族的封建主義的萌芽及前提的綜合，而從五世紀到九世紀才形成的。在西歐的封建主義，繼續至十六世紀；在東部德國和俄國至十九世紀農奴制的「復活」還存在着。封建主義的殘餘物，雖到現在，也還存在於很多的國家中（西班牙，巴爾幹諸國及其他），但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諸國，那更特別的強盛。蓋封建的榨取是和資本主義的榨取結合給帝國主義培養着的。史太林在一九二七年，關於中國革命問題，反而反革命的托羅斯基主義，對這樣指摘了：「中國經濟的特質，不在商人資本向農村的侵入；而是封建遺制的支配，在封建的中世紀榨取壓迫農民的方法保存之下，和中國農村中之商人資本的存在結合着的這一點。」在這些國家中，反封建的鬭爭和反帝國主義的鬭爭是一致的。

## 六 資本主義的構成態

資本主義的構成態，是在十六世紀開始構成的，適合它的技術基礎，是在第十八世紀末期，跟着進行機械生產才產生出來的。其主要的階段如次：家庭大工業，工場手工業，機械

生產或工場時代。資本主義發達的古典時代——自由競爭時代——自十九世紀末葉至廿世紀初頭，才給獨占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時代所代替了。

資本主義的構成態，是最後之敵對的構成態，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然經濟的各種形態不同，它是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的生產也和單純的商品生產不同，它是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切發展，是以收買勞動力為基礎，其根本的發動力是利潤的獲得。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和從前的構成態不同，它是以經濟的強制為基礎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外的強制也負着偉大的任務，這是必須預先表明的。馬克思舉出兩個事實，當作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的特徵：（1）生產手段集中於少數者的手中，因此它不復為各個勞動者直接所有。（2）勞動本身被組織為社會的勞動。「依這兩個事實看來，則資本主義生產，是廢棄私有和私的勞動。」資本主義生產樣式的根本矛盾，是勞動的社會性質與私的占有的矛盾，所以這個矛盾，是表現普羅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的鬥爭。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交界，資本主義達到最後的帝國主義發展階段，在這階段中，資本主義的矛盾，達到了最高級的發展，帝國主義戰爭——一九一四——一八年——以後，顯出了戰後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而使一九二九年以後到來的世界經濟恐慌更加尖銳化和深刻化了。在帝國

主義的時代，資本主義的不均等發達，日益激化，所以在資本主義之最弱的一環中，是可能將資本主義世界的鎖切斷的。

## 七 社會主義的構成態

社會主義的構成態，和在封建的諸關係圈內所構成的資本主義構成態不同，它爲普羅列塔利亞革命勝利的結果，在普羅獨裁的條件之下所建立的。最初生成社會主義之構成態的，是在世界上，最初組織普羅獨裁之國家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但是傾覆資本主義的革命和普羅獨裁樹立以後，爲着新社會第一階段——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必要一個過渡期的。普羅列塔利亞，通過了過渡期的全體，一方面使其獨裁強化，同時對敵對階級的殘餘物鬥爭，和把其清算；一方面在鬪爭和建設之中，變更農民自身的性質，另一方面又再教育農民，組織社會主義的生產，因此廢棄了社會的階級分裂之基礎。

「大變革之年」（一九二九年）以後，普羅列塔利亞底社會主義之全線攻勢的結果，使蘇聯走向社會主義的時代，在工業反農業的領域中，解決了「誰對誰」的問題，把個人商人徹底的一掃，清算了失業和農村的貧困及蘇維埃聯邦之雜多的制度構造，使新經

濟政策的俄國轉化爲社會主義的蘇聯。實現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根本方針；最後的三掃資本主義的要素及階級一般；完全廢絕發生階級差別和榨取的原因；克服存留在經濟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存物；國內的全體勞動人口都變成社會主義的社會意識之積極建設者了。其結果，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以單一唯一的社會主義生產樣式貫徹到最後，目前，社會主義的生產樣式，絕對的支配着蘇聯的經濟。

從資本主義至社會主義的過渡期，是佔着新社會的第一（下級）階段，這階級的特徵，是「布爾喬亞的權利之殘滓，即勞動及消費的標準化，支配這些的統制是還要一時保留下來。在社會主義之下的分配，是依照「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來辦理，在蘇聯完成了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社會主義的社會建設——後，則它更將向着社會邁進！生產力之今後的巨大發達，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的差異絕滅，是走向以應各人的能力而分配生產物和國家消滅爲特徵的新社會之最高階段。

「在共產社會之更高的階段中，消滅從屬於奴隸化的分業，同時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之對立消滅以後，勞動就不單是爲生活的手段，且當勞動自身成爲生活的第一欲求時，伴着個人的全面發達，生產力便也增大了；當共有財產的一切源泉滾滾的流出時——只

有在這個時候——布爾喬亞的權利思想的狹隘眼光，才可完全克服，在社會的旗上，才能大書特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在區別五個的社會構成態的場合，並不是主張一切民族，在其發展中都必定要順次通過以上的一切構成態的。各種民族，按着具體的歷史條件與事實以各種的方式，通過從先階級社會至無階級社會的他們一切共通的道路。例如：奴隸和奴隸主之分裂是社會階級之最初的分裂，雖然在原始社會底胚胎內已經發生，可是那家長的奴隸制，並不是到處都能發展到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的。卽如在日耳曼民族間，在斯拉夫民族間，都沒有發達到奴隸的構成態。當它在這里轉化爲共有的封建所有，轉化爲自由協同者的從屬農民的時，它僅負着副次的任務。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底可能性，在家長奴隸制中雖能夠給與，可是，只有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之下，例如：在古代世界的條件之下，這可能性才可轉化爲現實性。未必一切的社會都要通過資本主義的構成態，或封建的構成態。在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給其他諸國開闢了得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階級，或封建的發展階段（甚至在有家長制度的民族之間）的可能性。馬克思在反對超歷史的圖式底意見時，他是十二分注意這個事情的。又當伊里奇論及歷史發展的順序和形態的特性，說它沒有廢止世界史的

一般合法性的時候，也是十二分注意這個事情的。

## 八 構成態和制度

在敵對的構成態和過渡期的經濟構造，包含着各種型式的生產關係。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序說」中，如次的指示着：「布爾喬亞社會，是最發達，最多樣化的歷史的生產組織。表現其諸關係的諸範疇，其構造的理解……：同時，是可能洞察一切死滅了的社會形態的構造和生產關係。布爾喬亞社會，是從這些社會形態的廢墟和要素所組織的，其一部分是爲布爾喬亞社會還未完全克服的遺物而延喘下來的殘命，另一部分，是前以前只作暗示而存在的東西，發達到充分的意義。」例如：在古代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中，能夠發現支配的奴隸所有者的生產樣式外，還有和它不同的如次所說的經濟制度：成爲奴隸之一源泉的自由零細地經濟，即比較奴隸勞動，更多生產的勞動形態的封建諸關係的萌芽（農奴制）；封建的構成態，包含着氏族社會及奴隸所有者社會的殘餘物，同時也包含着新的資本主會的生產樣式的萌芽。

資本主義的構成態，除支配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外，同時也包含着已經死滅了的



生產形式——封建農奴的，奴隸所有者的，氏族的社會——的殘遺物。資本主義的構成態，使在資本主義之先前的構成態中，作為「暗示的」，即是作為萌芽而存在的價值法則，及商品交換，發達到最高峯。伊里奇在過渡期的開始就如次指示着：在我們之下有五個不同的經濟制度：（1）家長的經濟（在顯著的程度上為自然的）。（2）小商品生產（出賣穀物的農民大多數）。（3）私經濟的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伊里奇看透了這一切制度之中，社會主義的制度結局取得勝利，必須驅逐一個而改造其他。其次，史太林在第十七回黨大會中，也已經這樣地說了：「第一第三和第四的社會經濟制度，已經不存在，第二的社會經濟制度，被第二位所驅逐，第五的社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成為支配全體的，成為通過國民經濟全體的唯一統帥了。」

我們還要注意的，是舊的生產樣式的一切殘餘物，或新的生產樣式的萌芽，不能和支配的生產樣式無關係地獨立地存在着。各構成態，在其體系中包含着某種支配的典型的生產關係，這支配的典型的生產關係為一定的構成態的基礎及其運動的法則，而使其餘一切類型的生產關係，從屬於它自己，並且將其加以適當的變更。「在各種的社會中，生產關係構成一個全體」（馬克思）。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或者驅逐其

餘一切異型的生產關係；或者使其從屬於自己，或將其變更！在蘇聯，社會主義的制度，當通過國民經濟全體而為完全的支配的唯一統帥力之前，對於其他的制度，都盡了同樣的指導任務。零細地經濟是各種制度，有機的依存着支配的生產樣式的一個明顯之例。它發達的進程，在各種構成態中，又是各各不同的。在古代社會中，不堪與支配的巨大的奴隸所有者行經濟底鬭爭的，自由零細農民發達的主要方向，他們不是變成奴隸，就變成中世的農奴之先祖的農奴。於封建主義時代，自由的零細經濟，被卷入封建的諸關係之軌道，而轉化為農奴了。恩格斯表示過：就是在古代的農奴和中世的農奴之間也會有過自由的布蘭克人。在商品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支配的時候，於農村的前途上，開拓了新的資本主義發達的道路。即是「農奴成為商品生產者，」根本打破了是同質的村落，而却發生新的階級差別（富農，中農，貧農，佃戶，）新的權取形態和階級鬭爭。只有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才能在農民的前途上，開闢和以往一切的構成態原則上不同發展的道路；從長期間的權取（無論它以怎樣的形式來表現）中被解放出來的道路，一掃貧乏，改造農業為社會主義的道路。那末，所謂社會制度者，是指特定型的生產關係，可是這個生產關係，既可成為支配的生產樣式，也可形成在舊構成態的胚胎內之新社會經濟的構成態底萌芽，又

在新構成態的條件之下也有着舊構成態之殘遺物。再者，各個制度（不用說是受相當的變動，）雖是存在於各種構成態，可是在支配的生產樣式中並不發達（例如單純商品生產）的場合也有。

於是，敵對的構成態也是一個生產有機體。即是雖可說是有支配的規定的生產樣式的某統一體，然這些生產關係體系，是依支配的生產樣式而變動，且包含着深密密從屬它的各種雜多的制度。只有在先階級的構成態（其崩潰以前）和無階級的共產構成態，生產關係才能完全帶着同樣的性質。

## 第七章 社會發展的理論

### 一 世界史之統一和生產力

馬——伊主義的古典家們，抽出生產關係作爲一切社會是真實下層經濟基礎，由此在生產關係和形成上部構造諸形態（國家、家族、法律、宗教、科學、藝術等）的其他一切社會關係之間加以區別。在理解社會的全體及在其一切要素的交互作用中的各種社會形態底地位和任務的時候，下層基礎和上部構造的區別，就成爲其出發點了。布爾喬亞的社會學說，視爲社會發展的究極原因的，是甚麼的各個要因呀，或是各種各樣同格的獨立要因底共同作用；但下層基礎和上部構造的理論排除這樣的布爾喬亞的社會學說，而把社會作爲生產有機體來考察；也把社會全體各種側面的交互作用的事實，及其交互作用力的泉源，做同樣的說明。

史的唯物論視爲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畢竟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首先如連鎖一

般結合着各種構成態，把繼起性和連續性搬到人類歷史的發展中。在結安涅哥夫的信裏，馬克思如次寫着——各個後續的世代，是由先行的世代所獲得。比方說爲了新的生產，把効用於他們的生產力作爲原料來供給自己的使用，由於此種單純的事實，在人類的歷史中發生繼起的聯結，人類的歷史才被形成。而且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間的生產力，同時又是他們的社會關係若越是成長，則愈成爲人類的歷史。

生產力是這樣地形成人類史的基礎。生產力的發展，使各個的社會歷史成爲人類的世界史。在先資本主義構成態中，生產力發展的水準還在極度低下的時候，以某種的形式和程度，創造出各個種族和民族及國家的『原始孤立性』；可是跟着競爭一普遍化，創造出了的交通機關和世界市場之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發展，同時各文明國民和各個人的慾望滿足成爲和全世界有着關係的樣子，只要是撤了像過去一樣的各個民族之孤立性，就可開始創造出另外一個世界史了。然而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中，固有的內部矛盾，是在資本主義達到獨佔階段，在戰後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及法西斯的條件增大之下，才到了極度的尖銳化；但同時這矛盾也暴露了帝國主義間的一切對立，而且使它極度的激化了。他方面，無論在任何的國家，在資本主義諸國的交互關係間，都包含着資本主義經濟的計

劃統制底一切可能性。法西斯傾向的增大，極度推進了在各國間的隔絕性和孤立性，同時使動物的排外主義發展了，把「自國人種」稱爲有着支配各國人種使命的世界史擔當者。只有新社會的建設，在人類的歷史上才能開始創造真正計劃經濟的世界統一，於是，人們創造出了爲了成爲世界史的意識創造者的一切必要條件。

這樣，使各個社會經濟的聯結越發擴大下去的，生產力的前進發達趨向於人類世界史的形成。社會經濟的制度，爲了生產力的極度發達而成爲障礙的時候，那麼爲了要維持既獲的生產力，並使它更加向上發展的原故，生產力則非打破在其中發達出來的生產關係不可了。這樣生產力停滯的明白實例，是以資本主義的危機爲基礎而發生的世界經濟恐慌，它是破壞資本主義生產力的東西，是證明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力的向上發達是不可能的。

## 二 技術和生產力

人類社會對於自然的支配程度，和人類社會一定的經濟構造，規定着它們的東西，畢竟是生產力的發達。技術的一定水準，其發達常常是伴着和它的對應的人間勞動力的發

達程度和生產關係，及以這個生產關係為基礎而發達的上部構造。『手磨白……是以領主領首的社會；蒸氣製粉機是以產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哲學的貧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使這命題更加發展，而如次地給以定式化：『技術學是鮮明人間對自然的能動關係；人類生活的直接生產過程；同時又是鮮明人類生活的社會關係及由此派生出來的精神現象。』（資本論）馬克思又在『資本論』的別個地方如次地指出——區別經濟的時代不是依照生產甚麼來決定；而是怎麼樣由怎樣的勞動要具所生產來決定的。』恩格斯在一八八四年六月廿六日也用同樣的意義寫信給考茨基——在你的場合正和下面的情形一樣：沒有把農業和技術從經濟學切離出來……輪作，人工施肥，蒸氣機關，機械，是不能從資本主義的生產切離的，正如蒙味人和野蠻人的工具不能從他們的生產切離一樣。恰恰跟最新式的工具是制約着資本主義的社會同樣；蒙味人的工具也是制約着他們的社會。

這樣，通過一定的社會經濟構成態的發達，特定型式的經濟關係是由跟它相對應的生產力發達之型和水準來規定的。史太林有名的口號：『要修好技術呵！』一方面是表現

有的意義。在這個口號中，強調著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並且在這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的上部構造形態更加向上發展的事業中，國內技術的改造是有着絕大意義的。在清算資本主義及其根源，和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使在農村及都市的生產力增進，這是有着決定的意義和任務的。『因此，爲了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就必需二十萬輛的曳引機和三百萬匹馬力。如目前所見到的：能夠剷除在農村資本主義一切根源的力量，並不是單薄的。這個力量已經二倍超過如伊里奇爲未來前途所述過的曳引機的數目了。』更在史太林的口號中，技術幹部的問題，熟練勞動力的問題，在社會主義建設及其他一切條件下，當作最重要的條件而正面地提出來了。史太林在第十七回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如次地指出——在我們工業的一切功蹟裏，可視爲最重要底功蹟之一，是獲得新技術，使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前進，並能在這期間中教育及養成出數千的新人和新的指導者；新技術和技術家的全層；數十萬的年青的熟練勞動者。其後，史太林更在跟治金學者的談話中，更加明白深刻地強調着：爲了要使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更高發展，那麼，幹部養成的問題，是當作其主要任務而有着絕大的意義的。『具有才能了解的優良勞動者，非懇切地養成他們不可。正像園丁要收獲所祈望的果樹一樣，我們就非十分留意養成人間不可』（真理報）史太林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在赤軍大學卒業式的歷史演說中，如本地說着——「技術解決萬事」的口號，是我們清算技術領域中的飢餓，幫助完成廣泛的技術基礎的。人才的問題在今日是重大的，要想竭力利用技術，就必要獲得了技術的人才。要是沒有獲得了技術的人才，則技術是死的。以獲得了技術的人才當做先頭的技術，是給與奇蹟而且又非給與不可的。」這樣，史太林就提出了「幹部解決萬事」的口號。在生產力的龐大增進底事業中，示出勞動力決定意義的明顯實例，是史太哈諾夫運動。它數倍凌駕「以技術為基礎的」標準；比較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而建和起了獲得更高度勞働生產性之旗。

以上所說的話中，史太林說生產力的發達（在蘇維埃聯邦為社主義的生產力發達）畢竟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社會主義也和歷史上的生產樣式同樣，是立脚於和它相對應的技術的基礎上的，使這個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適用到蘇維埃聯邦的條件，更加發展和豐富。作為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根本經濟任務的，即是完成國民經濟的改造；為了國民經濟的一切部門，創造出最新式的技術基礎。史太林再比較生產力的各個要素，而力說當作「最大的生產力」（馬克思）看的勞働力之主導的意義。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當改造期的初年，雖然第一是要求創造廣泛的技術基礎，可是在技術的領域中飢餓被清算

的今日，是可從正面提出高級熟練幹部的養成及勞動階級變化技術底向上的任務了。

### 二 當作生產力發展形式看的生產關係

採取技術及技術勞動使用法之形式的生產力，是人間勞動力的發展尺度；表示其生產性之水準的尺度；又是社會的生產過程，在其中所進行的社會關係底指針。一切社會的發展，結果都要從生產力的發達來說明。

然則生產力的發達本身，是依存着甚麼呢？它由甚麼來決定呢？

把史的唯物論替換為觀念論的社會學理論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們，以自然科學的發達當做技術進步的原因，結局把技術的發達和自然認識的過程同一看待。生產力的發達，若依照他們看來，實在是歸於精神的過程，和我們對自然認識的增進；而且把生產關係當作生產力的受動結果來考察。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生產力是能夠無限地、自由地發達，而且，這個關係，不會變成生產力發達的障害。這樣的少數派的理論，也是特別從這裏拿出來的。從證明普羅列塔利亞運動之未成熟的目的，引證出生產力的『不充分』發達，也是從這裏來的。布哈林一方反對生產力發達的觀念論說明，然一方又站在機械論的自然

主義見地。他從事物的見地，把生產力作爲「一方面是機械各色種類的原料和燃料等等的總體；他方面是各色種類的勞働力現物底總體」（過渡期的經濟）來考察。從生產力抽象其社會內容，階級內容；把生產力發達的源泉求諸境境和社會的交互關係中，完全一貫他自身機械論的均衡論。『社會和自然的鬥爭——布哈林寫着——自然的『人間化』過程增進；某對立物向其他的不斷的滲透，成爲一切運動的根底。就是說，它是生產力發達的合法則性，是其運動的基礎。』布哈林無視生產力的社會底質。他的活力（*Energy*）均衡（*Balance*）學說當做走上社會和自然之均衡條件及向上線的社會發展而以生產力一般（和其發展形式沒有關係）的現物發展底主張爲基礎的。右翼機會主義拒絕『富』的口號和國家的產業化；特別是由犧牲重工業，而使輕工業發達的主義，向榨取農的社會主義的轉生等等的，這個理論作基礎而生出來的。

以上一切史的唯物論之歪曲和偽造底一般缺憾，就在如次之點：即是當他們考察生產力發達之原因的時候，忽視了生產力的社會形式——生產關係，事實上就是否定了生產力之社會的即階級的性質，把生產力還元於會社和自然之『極限概念』中，只從事物之見地來考察生產力；把生產力視爲消失了一切階級性格之中立物。

史的唯物論，是把生產力當做一個社會的範疇來考察。自然力（生產手段和勞動）只有在兩者相結合的場合，才能成爲社會的生產力；可是這結合的樣式和性質，即這個社會的形式，是要以歷史的特定型的生產力爲其特徵的。生產關係，於是成爲生產力的存在形式；是人間向社會生產底活動的、向自然影響的形式和結果；當這個東西（生產關係

——譯者）是一個物質的關係。

伊里奇指出了社會的諸關係是從物質的關係和意識形態的關係來區別的。『後者對前者不過是上部的構造；而且前者是離開人類的意識，當做爲適合他們維持生存的人類活動底形式（結果）來構成』的。伊里奇一面揭破反對馬克思底提言（生產關係從意識獨立着）的多數『批判家』們的論據；而且曾如次地指出了社會的存在是從意識獨立着的馬克思提言，這並不是說『有意識的生物即人間的社會，能夠從有意識的生物存在獨立存在而且發展的。』『人們互相結合，作爲有意識的生物而結合共存的關係的，斷不能說：社會的意識和社會的存在是同一的。人們雖然是互相結合關係，可是無論多少，在複雜的社會構成態中——特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構成態中，都沒有意識到在那裏組成怎樣的社會關係呢？它又依從甚麼的法則而發達呢？例如農民出賣穀物，因此在世界市

場上和世界中的穀米生產者結合着共存關係，但他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也沒有意識到從交換中能夠組織怎樣的社會關係呢？」這樣，生產關係是人們社會生產活動的歷史上特定形式；不管人們有沒有意識到它，然它自身是依照內在的客觀理論而發展的。並且在這一點上，是有着生產關係的物質性和客觀性的。

生產關係的組成及發展的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被組成怎樣的社會關係呢？人們縱然沒有意識到它；然而它也可以自生的發生。那麼，經濟的諸關係，恰像從人們的意識和意志中獨立出來的某種外的自然力一樣，是以自然法則的必然性來組成；而不是依從社會和國家的計劃作用。於是人類和他們自身都是社會關係的奴隸了。反之，社會主義時代就是在原則的不同的狀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之發達的合法則性，早先是沒有帶着自生的性質的。在社會主義之下，生產關係不是自生的組織；而是基於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底計劃的意識統制而組成的。可是，並不是說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由人們的意志和意識而決定的；毋寧是相反，生產關係，在蘇維埃聯邦同樣是人們物質生產活動的必然形式，是由生產力發達的水準來規定；離開人們的意識和意志而獨立，即是客觀的存在，而決定意識和意志的。可是生產關係的形成過程，是和資本主義不同，它沒有帶上自生的性質；不是

自然發生的進行。這兒，生產關係在和榨取農、資本家、小布爾喬亞的生活樣式、習慣、傳統等的鬪爭裏，是作為預先被意識、被算定了的過程來形成的。蘇維埃制度，一方面清算資本主義的諸關係，把個人經營的農民改造為集團經營者；他方面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用意識的計劃使其格外強化，重新創造和擴大。那麼，在社會主義之下，是和已往一切的構成態不同的，人們最初為一個共同的意志，統一的計劃所領導並且意識地創造自己底歷史。社會發展之盲目的自然力和自生的法則底支配，在社會主義之下是消滅了；因此，人類遂從必然的天國飛躍到自由的天國；和已往一切的歷史有着原則的差異，只有跟它有着固有合法則性的新社會制度才能夠發生。

社會關係，在新社會之下，是由人們意識的意志所決定，服從他們自身的社會統制；從屬於受過組織的集團意志。因為這樣，人們才能一步一步地完成其希望的目的。但是不理生產關係是被自生的形成呢？還是為意識所組成？總之，在一切構成態中，生產力的發達，是受它的發展形式；它的運動法則底生產關係之影響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向上期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為着生產力的巨大發達；為着近代機械技術的創造，也給與它不少的餘地。然其後生產力之更向上發展；技術及社會的勞動再向上進展，遂被資本主義的私

有制度所限制和阻止了它雖然也包含着一種企業的計劃底協業，而在已經社會化着的勞動中，加以一定的限制，首先就是由於運用技術上的改善於被機械置換了的支付勞動的量的，於是技術的發達，就受到限制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作為生產的社會性質和私的獨佔的矛盾而出現。

這矛盾，在帝國主義的條件下，成為更深的尖銳化和複雜化，而引起技術的頹廢。『就算是一時的吧！只要獨佔的價格被設定，向技術的進步的；從而又向其他一切的進步的；向前進運動等的動機，也消失到相當程度了。唯其如是，企圖人爲的阻止技術進步之經濟的可能性，也就發生出來了。』資本主義之一般危機的特殊條件，更加的阻礙着生產力的發達。（『拋開技術』的口號，在石炭業中，穿孔機的使用是一部的被廢止，在建築中廢止機械的使用而代以十字鋤和鐵鏟，在農業則廢止曳引機而代以馬車等。）不消說，技術的頹廢，並不是說因為生產力發達的一切可能性完全消失的意義。技術不均等發達的結果，在各國的諸產業部門中，產生着技術更高級的成長。

在蘇聯，却和這個原則的不同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變成在都市及農村中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如怒濤般發展的重大要因。以國民經濟技術的再建爲基礎，而創造照應於社

會主義經濟的技術基礎，這是蘇聯根本的經濟方針。例如在畜牧獎勵事業中，畜牧發達的焦點，是放在社會主義形態的發達強化；集體農場和畜牧國營農場的發達上的。我國的畜牧全體，農業全體，是以此為基礎而使其向上發展的。」（莫洛托夫）

在蘇聯生產集積的發展速度，從其水準上看來，是凌駕最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了。「我國成爲最被集中的工業國，這是表示着：我們以最優良的技術為基礎而建設我國的工業，憑其庇蔭，得以保證未曾有的勞動生產性；未曾有的積蓄速度。」

#### 四 當作社會發展的起動力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

### 矛盾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發展過程，不是在受動的過程中，而是在激烈的階級運動的過程中發生的。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動者對於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勞動日的延長；工資的減少等）底鬥爭，使資本家向技術的改善和向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方法移行。「一八二五年以來，幾乎所有的新發明，是想傾全力減低專門勞動者的勞動工資之企業家和勞動者間衝突的結果。每當稍有一次顯著的罷工後，就能出現新的機械。」史太林提



倡『在再建期技術解決萬事』的口號時他並沒有把技術獲得的任務本身，看做應義的任務，而是當作在當時階級運動中最重要任務之一來考察。『若果我們在好久以前，就轉移到技術的研究和技術的收獲的話，而且再三地加以嚴密的經濟指導；那麼妨害者們是不能加它們以多大的損害了吧。』

這樣，在各個社會的構成態中，生產關係變成爲一定的生產力底發展法則。它沒有排除生產力本身之內在理論的發展。『例如：使機械紡績一定必要織機，使兩者又隨之而發生在漂白業和染色業中的機械的化學革命的必要』（資本論）但是；這個發明的內在理論，是一方引起生產力的增大，而結局自己也從屬於社會的形態。

生產關係，成爲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完成一個能動的任務；但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中，完成它主要任務的，是內容即生產力的發展形式即社會的經濟構造，雖由跟它對應的內容（生產力）而出來的；但同樣作爲生產力超越限制的發展結果而被廢棄的。作爲生產力發展變化之結果，所謂社會的形態——生產關係——崩壞的這種法則，在馬——伊主義社會發展的理論中，占着中心的地位。形式不是內容之受動的結果；是能夠用自己的形式去影響到內容的發展；可是普列哈諾夫却否定了這個原理。當做一切歷史

生產樣式的起動初端看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序文中給與這法則以古典的定式化：『社會物質的生產力達到一定發展階段後，生產力遂和在其內部發展了的現存生產關係或和它不過是法律表現底所有關係發生矛盾。這生產關係，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一變而為它的桎梏。那時，就是社會革命時期之到來。』

在各構成態胎內生產力成熟的事情，是同時表示着：爲了新的生產樣式，爲了新的構成態底物質前提能夠創造出來。『只要在一個社會構成態中，還有發達餘地的一切生產力是不會在發展以前沒落的；又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它存立的物質條件，是決不會在舊社會自身胎內未成熟以前出現的。這樣一來，人類也常常只能提出得以解決的問題。蓋仔細地討究時，常常會覺悟到問題本身的解決的物質條件是已經存在了嗎？或最少只有在生成的過程時才發生的事實吧！』（經濟學批判）可是在這一點上，從封建的構成態向布爾喬亞構成態底推移，是和社會主義的變革却有着根本的差異。即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已經在封建構成態的胎內被創造出來了；而且從這一點看來，布爾喬亞的根本任務，是要創造出跟它照應的上部構造的形態。

這樣，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辯證法的交互作用，也成爲人類史之一般的法則。各個的生產樣式，其特徵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矛盾的固有性質和形式。

例如：在單純商品經濟的條件之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作爲直接生產者——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的私的勞動和其（即私的勞動的）社會的性質之間的矛盾而表現。（這矛盾，作爲商品的內在矛盾而形成勞動的二重性，是可明白地表現出來的。）

在資本主義生產樣式之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起了質的變化，作爲生產的社會性質和資本主義私的佔有之矛盾而表現出來。勞動的社會化不絕地增進，爲了諸產業部門被細分化和專門化，生產者間的社會聯結，是益成緊密了。『這樣，一切生產雖給一個社會的生產過程所融合；但在另一方面，一切的生產由各個的資本家所經營，受他的恣意支配，社會的生產物成爲他的私有物。』這樣一來，生產形態和占有形態陷於不相容的矛盾，這矛盾首先成爲普羅列塔利亞和布爾喬亞的，在諸工場中的生產組織和在社會全體無政府生產的矛盾，而表現出來。

在蘇聯的過渡期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矛盾的性質，是原則的發生了變化，而採取

了不同的形態。立腳於生產手段之社會化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要求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勞働生產性。它促進生產手段的大量發展，促進技術的改善向生產的滲透；促進勞働者及生產指導者的文化底生產水準的向上，這樣就創造出了適合於自己底類型的生產力。一個的生產樣式代替其他個的生產樣式，畢竟是因為要使更高級的生產發達的原故。

『爲甚麼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勝利，而且又必定勝利呢！這是因為它比資本主義能夠帶來更高級的勞働樣式；更高級的勞働生產性的原故。對於社會它比資本主義也能給與多量的生產物；使社會更加地富裕起來的原故。』史太林還這樣強調着，即：『當作新的，更高級技術標準的模範表現着的斯達哈諾夫運動，就是表示着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產生；而資本主義是不能夠產生出這樣高級勞働生產性的模範。』當史太林出席斯達哈諾夫主義者協會之際，他就六個的條件來演說，銳利地批判『貧農的』平均社會主義和小布爾喬亞的理論；指出社會主義只有以起因於高級勞働生產性之『潤澤的生產物和各種類的消費對象』作爲基礎，『只有以社會全體成員的豐富文化生活爲基礎』才能夠得到勝利。過渡的根本任務——完全的社會主義建設之任務——要依據社會主義生產力的全面發展，依據清算蘇聯的雜多制度，把社會主義制度通過社會全體，而轉化

爲唯一的生產樣式，才能夠解決。由這點看來，過渡期的經濟特徵底根本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矛盾。『舊的東西和新的東西的，死滅了的東西和新生的東西之間的鬭爭——在這個鬭爭中，就是我國發展的基礎了。』適合於這根本矛盾解決的普羅列塔利亞社會政策，是新經濟政策。它一方面把最高統治權收到普羅列塔利亞之手；他方面指望容許資本主義，指望資本主義的要素和社會主義的要素鬭爭，期待以損害加於資本主義的要素，而使社會主義要素的任務成長，注意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建設。』

布爾喬亞社會是保護和維持以價值法則及剩餘價值法則爲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自生的發展過程的，但普羅列塔利亞社會和它不同，它是自己直接規定蘇聯經濟組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是作爲他們之經濟集中的科學表現，而直接顯現出來。在這個場合，實現普羅列塔利亞經濟政策之最重要的要具，就是計劃的指導，這計劃的指導底可能性及必然性本身，是從蘇聯的經濟本質從重要生產手段的國有、從農村社會化的增進所產生出來的。

## 五 當作敵對構成態的發展及交代法則看的階級鬥爭

在階級發生前的無產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是沒有帶着敵對的性質的，但在階級的構成態中，就和這個初期的社會不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它有着自己固有的特徵，這矛盾採取敵對關係的形式，由階級鬭爭而表現出來。即是這一切的鬭爭：在古代構成態中，是奴隸和奴隸主；在封建構成態中，是農民和土地的所有者；在資本主義的構成態中，是勞動者和資本家的鬭爭。在生產過程中，跟直接生產者間所組成的關係，是在敵對的構成態中；同時成爲階級之關係的。所以，在我們發見經濟進化底客觀的理論時，它是從明示歷史的發展下來的階級鬭爭形態那裏出發的。因此，伊里奇也強調着：『馬克思主義能夠在外觀上看來是迷宮和混沌裏面去發見合法則性，所給與他的指針，就是階級鬭爭的理論。』所以階級鬭爭除了『太古』的狀態外，都是全體人類先史的根本發展法則。馬克思在致華德邁亞的信中也如次地寫着——我固然可以說，發見近代社會諸階級的存在，和發見階級相互的鬭爭，這都不是屬於我的功績……在下面這幾點上可以證明我沒有創造出新的事實：（一）階級的存在，必定和歷史上生產特定的固有發展結合着的；（二）階級鬭爭是必然的要通過社會革命的；（三）社會主義不過是向一切階級的廢止的；向沒有榨取的社會底過渡。』

階級是在社會一定的發達階段，畢竟是在原始共同體解體以後發生的。生產力發達極度低下時，是沒有人間搾取人間的經濟基礎的，因為只有『血緣』關係專來支配着，所以，原始共同體還沒有知道甚麼是階級和階級鬭爭的。其後生產力跟着發達，在原始共同體內，發生了社會分產的過程。無論怎樣的一個共同體『在某個共同利害發生時，爲了遵守着這個共同的利害，它固然可說是在社會全體監視之下的，但它也非委諸各個人不可。』隨着時間的經過，這職務（變爲世襲了）對於社會就成爲孤立化和自立化了，這就是它對社會支配的強化。

『在向階級分裂的根柢上，存有分業的法則。』（恩格斯。）在『生產發達，人間勞動力成爲比他從前簡單的生存所必要的東西；現在能夠生產出更多的東西』的時候，在主要的生產手段成爲私有，像從前的樣子，把從戰爭中捉得來的俘虜，把他們不是吃就是殺，反之；如使他們成爲奴隸，利用他們的勞動力的時候，那時，階級就開始基於分業而發生了。然而一切奴隸不是完全都有利益的。要使用奴隸，就非具有二個條件不可。第一，要維持奴隸貧乏的生存手段；和第二勞動手段。因此，在奴隸制度成爲可能之前，生產力的發達和分配的不平等，就非達到一定的程度不可。奴隸制度，不久就在舊日共同體生活以上成長了。

的諸民族之間，成爲支配的生產形態；最後又成爲共同態分裂之主要的原因。專有着社會的職務，比之遺留下來的共同態大衆，在經濟上更爲發達的家族，是由於廣泛地使用奴隸勞動的結果，而從一般的共同態大衆中顯拔出來。發生了奴隸主和奴隸的兩個階級底是社會最初的巨大分裂。這樣形成的階級，是基於越發展下去的社會分業，基於專有社會職務家族的孤立化和分出；基於生產手段的私有形成（階級形成的主要原因）及以它爲基礎的奴隸制度發生，作爲原始共同態之內在解體的結果而發生出來的。

第二國際理論家們，在階級及國家的起源問題上，同樣是反對馬克思的學說，他們壓根兒是追隨着布爾喬亞社會學者的學說。考茨基跟着克姆普羅威茲之後，主張階級及國家不是作爲所有財產的結果而從內在的經濟發展發生出來的，而是從一種族征服其他種族中發生出來的。庫諾也是從征服來說明國家的起源的。恩格斯曾在和杜林的論戰中，批判過階級是暴力的結果發生這樣的見解了。『私有財產，常常作爲生產及交換的條件發生了變化的結果，只有爲了生產的增加及商品交易的擴大，其設定成爲必要的時候，才可以形成出來。由此私有財產是從經濟的原因發生出來的。在這裏暴力沒有發生任何的作用。』在其他的地方，恩格斯緊記着暴力對經濟發展的從屬的任務。『暴力與其說是支



配經濟狀態，毋甯說是效用於經濟的目的！」

伊里奇從馬克思的學說出發，使其學說更加地發展，對於階級給與最精密的定義。「所謂階級，是依照他們在歷史上特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站的地位依照他們對生產手段的關係（其大部份是為法律所確認和形式化）；依照他們在社會勞動組織中的任務。從而又依照他們對社會所有財富的比例收得法和大小而區別出來它是人間的大集團。」

可是，馬克思主義雖否定在階級形成的過程中，當做根本決定要因看的暴力意義；但在敵對構成態中，當為階級支配的要具和構成態的歷史變革主要條件底暴力，是承認的；它在社會生活上能負起重大的任務的。只有革命的暴力，才可傾覆苟延殘喘的社會關係，才能夠樹立新的階級的支配。

這樣，生產力及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在敵對的構成態中，用階級鬭爭表現出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無論何時只有由階級鬭爭才能夠解決，即是說只有由根本的變更，舊社會經濟的制度，和照應生產力更高級的發展階段所創造的新制度，才能夠解決。「社會的物質生產力，達到一定的發達階段時，那麼它勢必和其內部發達出來的現存生產關

係，或和那不過爲法律所表現的所有關係發生矛盾。這生產關係從生產力的發展形式一變而成爲它的桎梏，那時候，就是社會革命到來的時期。『社會革命是敵對構成態之交代的，從一個構成態，推移到其他個構成態底根本法則。但是在各構成態中，社會革命是用特殊的形態，以跟自己固有的性格底特徵和特質而發生的。社會革命是階級鬭爭最高的發現；又在社會革命中，盡其決定的，規定的任務的，是政治鬭爭，是由代表新的生產樣式的階級底政權獲得。

推動先階級社會的解體過程及走進階級社會，它是作爲在家長的氏族胎內，新新被形成的諸階級之激烈鬭爭的結果；作爲打破氏族秩序，樹立勝利階級的國家獨裁底社會革命的結果而發生的。史太林在集體農場突擊隊第一回全聯邦協議會的演說中，對於當作原始社會解體以後的人類先史的一般法則看的社會革命的法則，給與深刻的定式化。他力說在古代構成態沒落中的奴隸革命的決定意義；在封建制度崩壞中的農奴革命的意義；最後他更強調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的世界史意義，在這十月革命和一切從來的，總是以其他的形態代替一個搾取勤勞者的形態的『一樣的』革命不同，十月革命是最初建立『廢止一切搾取底目的』了。

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在帝國主義時代，『各個的國家和各個的國民經濟，不能成爲自足的單位，只好變做所謂世界經濟連鎖中的一環。』故此在產業資本主義的時代，當分析普羅列塔利亞運動時，通常能夠從各個國家的經濟狀態的見地去做整理，但到帝國主義時代用這樣的處理方法已經成爲不充分了。『在今日，是必須把當作一個整體看的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底全體系中的，能現存的客觀前提，作爲問題，並且在產業方面，發達不充分的無數國家，作爲這體系的構成而現存的問題，要是整個的體系已經向社會革命的方向成熟時，更正確來說是已經成熟了的原故，那麼難以克服的障害就沒有了。』所以，資本主義不均等的飛躍發展，就是在帝國主義之下，『帝國主義的世界戰線，是非常脆弱的，確實能夠從各國家的側面，切斷這一個戰線。』帝國主義的戰線，容易在脆弱的地方被切斷，這也是很明顯的事實。切斷世界帝國主義的連鎖，是要發生在最弱的一環，而且爲了能夠在最弱的一環中切斷這個連鎖，那麼這一環，從產業的水準看來，是必要平均地弱小的，即是說必要『在這一國內有着一定的最小限度的產業發達和文化。』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不是在人們活動之外或自動的過程，而是表現人間自身之合法則的活動，在階級社會中則表現階級鬭爭。從這個見地看來，就史的唯物論，對

於否定在歷史中的個人能動任務的宿命論；和沒有看見歷史的合法性，而只把歷史專從偉人的活動來說明的非決定論，都一概排斥。

史的唯物論主張：人類是自己創造歷史的，「人類史之所以異於自然史，是在前者是由我們來創造，而後者不是由我們來創造這一點上。」也即人類創造歷史。然而自然，不是人間發見了怎樣的空想，就依照這空想去創造歷史的。一切新的世代，在這世代產生的瞬間，它已經作爲現成的東西跟存在的特定條件會合了。『所謂歷史必然性的觀念，一些也沒有否定在歷史中個人的任務。馬克思主義，在分析事物的客觀的狀態中的科學實質，把它和大衆、各個的個人、集團、政黨等的實踐底活動力，創造力及主意之斷乎承認等結合着。』

在馬克思主義中最高級的科學客觀性和最大的實踐能動性，及行動性底這個值得注意的結合，是最近基羅夫在列甯格勒組織的廣泛底活動分子面前的演說中，深刻且明白表示出來的。『馬克思主義是教導勤勞者勝利敵人底唯一真摯的科學。不去好好地學習它，而想完成世界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只有認識支配社會發展底法則，才能夠明白個人在歷史進行中，有能動的任務，和影響歷史的可能性。在這個場合，認識就成爲歷

史的偉大原動力。史的唯物論承認人類是繼續不斷地創造歷史的，卓越的人物在歷史中表演着『顯明的役務』而且現在也表演着。同時，確立真正的自由，個人的才能和能力全部的發揚，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才有可能的。『在從來存在了的集合體——國家等等——中，個人的自由，只有屬於支配階級的個人，而且也只限於支配階級的個人才可能存在。』一個性的發達，向來都是帶着『一面的』性格，個性是被蔑視，被壓迫了的。在人類史上只有社會主義，才開始爲着人類的生活和發達，在原則上創造出不同的條件，把個人從奴隸制完全解放出來，使個人的才能、性格、能力全面的發達起來。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就是經過把人間改造爲大衆的；使個人的一切創造力全面的自由發達；從國民的下層去教育、養成天才和英雄的大衆的這個過程。

還有，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史的唯物論對於歷史認識的過程本身和人間對歷史之能動的活動，史的唯物論並不是從個別的個人，或人間一般的見地去考察，而是從階級鬥爭及政黨的見地去考察的。從這一點看來，認識改造世界底最高的主體物，就是以唯一科學的理論（馬——伊主義）作爲軀幹，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爲社會主義社會之勞動階級的前衛。而且他們所具有的馬——伊主義的理論，就是使其成員的意見和能動性得到

最高級的發揮，由此去客觀的認識歷史的現實進行，他們以此為基礎，又使對歷史的能動的活動成爲可能性了。當做歷史的認識和變革底最高主體看的；當做勤勞大衆的組織者，教育者及前衛戰士看的政黨的這個任務，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後，在伊里奇和史太林的著作中，都極深刻明晰地給與特徵了。

歷史上的偉人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史太林底任務就是在：第一他們比任何人都深刻，廣大，長遠地明瞭人類史底客觀的進行；組織數百萬勤勞大衆的意志和意識；使他們走向和資本主義的鬥爭，縮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初頭所生的苦惱；加速歷史運動的進行的這一點上。

## 六 上部構造的能動性和相對的獨立性

反對史的唯物論最大流行的一個『論據』是把史的唯物論還原於所謂『經濟的唯物論』，把社會的發展單從經濟的要因來說明，排斥其他的要因波及歷史發展進行的學說。於是，史的唯物論就變爲：在布爾喬亞社會學裏所廣泛普及了的所謂要因論，即是把歷史的發展從這個那個的要因作用；至多，不過是從各種要因的共同作用來說明的。

理論底亞種之一個。在世界大戰前，修正主義者們已經主張過——史的唯物論是決定在社會發展中的政治要因，意識和其他上部構造的任務，承認只有經濟才是歷史發展的唯一能動的原因，上部構造是一切受動的結果。修正主義者們，描寫邁史的唯物論這個漫畫之後，就把那個史的唯物論作『批判』，指摘史的唯物論的『一面性』，繼而主張：史的唯物論，有用流行的布爾喬亞哲學的社會學（第一是康德和馬哈的）去補足的必要。

史的唯物論和這種理論，並沒有甚麼的共通點。史的唯物論把所謂『要因』的概念本身，視爲離開社會全體的抽象。史的唯物論和這種『理論』反對。它建立起歷史發展的綜合的見解。即是說：史的唯物論畢竟是從生產力的發展出發，來規定在歷史發展中的各個要因（即社會形態）的地位和任務；這些的交互作用，相互依存關係的性質和限度；並且規定這些相互作用的社會側面的源泉本身。那麼史的唯物論對上層構造，不單只看做經濟基礎的受動結果。上層構造雖以經濟的土台爲建立基礎，但它也有着它自己相對的獨立性和內在的合法則性；同時也在經濟之上發生反作用；促進或延遲其發展的形式化。

在恩格斯給布羅荷的信裏這樣寫過——要是依照唯物史觀看來，在歷史中，成爲終極的規定契機的，就是現生活的生產及再生產。除了這個以外，我或馬克思都未曾主張過

甚麼萬一有人把這命題曲解爲：經濟的要因就是唯一規定的契機的時候，就這主張會化爲一個無意味的、抽象的空語。經濟的狀態，雖然是基礎，可是，土部構造的各種契機即階級鬥爭的政治形態和其結果——勝利階級在戰勝後所製定的憲法和其他，在法律形態和當事者的頭腦中一切這些現實鬥爭的反映，即政治上、法律上哲學上的理論、宗教的見解和它對教義體系的發展，這一切都可以影響到歷史鬪爭的進行，在很多的場合要特別規定其形態。在這裏，雖然有着這些一切契機的交互作用，但我們在裏邊看來，結局經濟的運動是必然的東西，通過無限的很多的偶然性來貫徹自己的。」

恩格斯在給錫丹爾耕白魯克的信（一八九四，一，二五）裏還如次指出着：即技術在極多的場合固然要依存科學的狀態，反之；科學更多的場合也依存技術的狀態和必要的。「靜水學（托里捷利以及其他）在十六七世紀是在因意大利要統制溪流的慾求所發生的。對於電氣，就是把我們已經知道幾多合理的事，漸漸在其技術的應用被發見後才可以……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等等的發展都是基於經濟的基礎，然而這些是相互的影響，而且又可以影響到經濟的基礎。我們不能這樣說：只有經濟的狀態才是唯一的能動原因，其他不過是受動的原因。否！在這裏，畢竟是有着以貫徹自己的經濟的



必然性為基礎的交互作用的。』

恩格斯在給康樂德·斯密特的信（一八九〇，十二七）中，講及政治形態向經濟的逆反響的時候，就這樣指出：『經濟運動大體上是貫徹自己，然而經濟的運動是自己創造，從獲得相對的獨立性的政治運動中，也非受到反作用不可。恩格斯舉出波及經濟發展底國家權力的三種反作用。它作用於同一個方向：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也有相反的作用；更有使經濟的發展轉向為特定方向的障礙，而趨向其他的方向的（這場合結局是歸於以上的一個。）當作經濟集中的表現看的政治，這次就會影響到經濟的發展。』政治權力要對經濟不發生效力時，則我們到底爲了甚麼要爭取普羅列塔利亞的政治將來呢！強力（即國家權力）也是一個經濟的力量。』

對於構成態的交代，政治鬥爭是有着決定的意義的。史的唯物論強調在經濟發展中的政治形態底絕大意義；同時反對（像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所做的）把政治經濟切離開來。政治形態不消說是有它一定的獨立性（其界限還是由經濟所決定）；對於經濟發達本身是決定的要因。然而其合法性結局是由經濟發展的合法性所規定。國家及法律，只在階級社會裏，在經濟的發展的特定階級才可發生和存在，也是爲支配階級服務作

爲他們利害的擁護機關。跟着經濟的發展；跟着階級鬥爭及變態的歷史發展，國家形態及法律形態也發生變化和發展。後者雖然可以反作用到經濟的發展，但它自身是跟隨經濟發展之後，在這個意義中它是沒有獨立的歷史的。同樣的，對於其他上部構造（宗教、哲學、藝術等等）也可以這樣說。社會意識的諸形態畢竟是由經濟發展所決定，在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是帶着階級的性質；支配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在社會中的支配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諸形態，是在意識中的存在反映，這個場合，這個反映，正如在敵對態中那樣：爲不完全的，歪曲的東西，甚至連神秘的空想的（如宗教）也有；或者像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是正確的，真實的科學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形態（馬||伊主義）和布爾喬亞的意識形態不同，它是存在和歷史發展的正確反映，由於這意識形態，是抓着大衆的，所以成爲自己批判的實踐的力量；這個意識可以反作用到經濟的基礎，促進社會發展的進行。意識形態對基礎的影響，是有兩種的不同。一種它是演出反動的任務，阻礙生產力的發達，使已將滅亡的生產關係永久化（法西斯意識形態的全體是其明白的實例）；另一種是完成其進步的任務，努力促進新的生產樣式的成熟和發展！

在社會主義經濟今後的建設和社會主義完成中的上部構造的意識形態的，特別是

文化革命的任務，是極爲重大的。勤勞大衆的再教育，殘留在各次意識中的資本主義底清算，集體農場農民意識的社會主義底改造，是關乎今後發達的根本政治任務。社會主義勞動規律的制定，技術的獲得，普及勤勞大衆間的科學和文化，這是社會主義建設成功的必須條件。在蘇聯條件之下的意識任務是極爲重大的。史太林在對最初的美國勞動代表的談話中，是這樣指出過——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普羅列塔利亞的意識變作社會發展的巨大原動力。『在這樣的場合，我國產業的原動力究竟是甚麼呢？就是第一，工場在我國是國民全體的東西，不是屬於資本家的，支配工場的，不是資本家的分子；而且勞動者的代表。勞動者的意識就是他們不是爲資本家而勞動，是爲他們自身的國家；爲他們自身的階級而勞動，這個意識就是在我國工業發達改善的事業中的巨大的原動力。』

在蘇聯的條件下，普羅列塔利亞國家和蘇維埃憲法等上部構造，都盡着絕大的任務，它能動的促進社會主義如怒濤般的發展，形成社會主義建設的有力武器。例如：在一九一八年所制定的蘇聯憲法（一個的上部構造）是確認爲當時所創造出來的蘇維埃權力基礎，『是記載一般所見透的蘇維埃國家向社會主義的方向的將來發展』的，它是爲了社會主義底鬥爭的旗，保證國民經濟的向上，確保大衆物質的福祉及勞動者文化的成長。

然而到了蘇維埃第七回大會中，「我們的國土在社會經濟基礎上能夠根本的再建，改造爲社會主義的國家。」（莫洛托夫）生產手段百分之九十六已經歸入國家集體農場和協同組合；在蘇維埃第七回大會當時，生產手段僅百分之四，是屬於私有者。在蘇聯的這個根本變化，也不得不反映到蘇維埃憲法的；從這點看來，一九一八年的憲法的各個部分，是成爲時代的陳跡了。「但是，若借拉薩爾的適切的表現時，則當作國家的根本法看的憲法，須是『必然的創造出以外一切的法和法律制度的作用力。』那麼憲法在正確的反映國內階級勢力的交互關係時，它就成是社會制度強化的有力武器。」（莫洛托夫）蘇維埃第七回大會的決議，就是使我國的憲法和社會主義的所有全勝與在蘇聯中的階級勢力的現狀一致起來，這樣它就成爲效用於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更強化的作用力了。跟這個（憲法）同樣可作爲模範的事實，就是在第二回集體農場農民突擊隊大會中所採用的農業『自由協同組合』規約，它表現集體農場制度的巨大成功，它是在蘇聯集體農場發展的經驗全體總計；它自身又成爲着集體農場制度更高的發展和強化底鬥爭；及對集體農場的大衆豐富文化生活的前進運動之重大要因。

在下次新社會更高級的階段，跟『布爾喬亞的權利』之殘存物的最終消滅同時，如

國家、法律、政黨、宗教等的上部構造也要消失的；其他一切上部構造（科學、藝術、道德、生產管理機關等）也會本質的發生變化。

## 第八章 史的唯物論的最近發展

### 一 和布爾喬亞社會學的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發見的唯物史觀，在伊里奇及史太林的著作中，得到更高級的發展和深化。形成史的唯物論發展到伊里奇階段，和由史太林其後發展底基礎，首先是這時代的條件和特殊性。資本主義達到其發展之最後的帝國主義階段時，在資本主義的諸生活領域中，就發生本質的變動；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發生了空前的深刻化和尖銳化；諸階級的勢力關係和戰術也起了變化；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形態和方法也起了變化；事件千變萬化地展開；普羅列塔利亞的戰略和戰術上的任務，極快地轉變；同時新的型式的政黨也被創造出來——這一切新的事實和事變，是必然地使整個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史的唯物論的內容越加豐富起來了。馬克思主義，不是當做死的教條，而要變成生動的生活指針，那麼非在理論上去把握這一切的新事實和事件不可了。伊里奇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

所定式化了的史的唯物論底根本原理出發，而照應這時代的新的條件和特殊性，使史的唯物論的一切根本概念，得到高度的深刻化和發展。從這一點看來，史的唯物論之伊里奇階段底特徵，就是基於帝國主義時代之極豐富的材料而使史的唯物論發展的。伊里奇當前的根本任務，在根本上是規定史的唯物論發展之伊里奇階段。史的唯物論的一切根本問題，在伊里奇的著作中，都是在某種程度上，直接或間接和其根本任務聯繫着的。當作帝國主義時代的最高的概括化和反映着的史的唯物論之伊里奇階段，是人智所有的積極成果的最高總計；同時是從世界史所教示的一切徹底的結論。

伊里奇和史太林所以能使史的唯物論發展，是因為他們和布爾喬亞社會學說作毫不讓步的鬥爭；他們排擊了欲散佈它（以某種形式）於勞動階級的企圖。當資本主義的向上期，布爾喬亞社會學說，在某個程度上，是包含着唯物史觀的要素（發生於觀念論一般的地盤上的），反對封建秩序，完成了某種進步的任務；可是跟着布爾喬亞掌握政權後，勞動階級開始發動獨自的運動，於是布爾喬亞社會學思想發展的合法則性，在根本上就形成爲對史的唯物論鬥爭之迫切的需要和欲求所規定；形成爲「反駁」史的唯物論，要證明布爾喬亞秩序永久不變性的必要所規定。布爾喬亞社會學在一切的根本問題上，對

史的唯物論採取了絕對相反的立場。對於社會的歷史科學底唯物論原理，他們以史的觀念論的原理來替代。奧古斯特·孔德曾主張說——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人間理性的自己發展。社會學上所謂心理傾向的多數學說和少數學派，在近代社會學中，採取着明顯公然的觀念論立場。把社會發展的合法則性，求之於地理環境的條件；生物學的法則；或是諸種要因的交互作用中的一切自然主義及折衷主義的潮流，結局都是在某種形態中，陷入觀念論的錯誤。物質生產的概念，對於一切布爾喬亞社會學是絕緣的。

布爾喬亞社會學其次的性格特徵，是反對辯證法的發展原理，它是明顯的反歷史主義。布爾喬亞社會學者，談到發展的場合，他們所謂發展，是平和的漸進的進化，是漸次量的增減。因此布爾喬亞社會學，無論社會經濟構成態的學說；或是歷史一般法則和特殊法則的統一，都沒有正確的解決。他們在一切民族和一切時代之間，設立了同樣有效的一般法則。它的其他性格的特徵，即：圖式主義；社會學構造的人爲性；主觀主義等，是和布爾喬亞社會學的這抽象性聯繫着的。一切布爾喬亞社會學和馬——伊主義的階級鬥爭論都發生過鬭爭，都是企圖以階級協調和階級和平的理論，來代替這個階級鬥爭的理論。

最後讓我們來談談布爾喬亞社會學之其次的重要特徵罷！布爾喬亞社會學當其分



析社會現象時候，究極的總是從個人和其屬性出發，結局的提倡反對以社會的經濟構造爲社會分析出發點的史的唯物論。即使在布爾喬亞社會學的內部，有着各色各樣的潮流，企圖克服社會學中的原子論的個人主義的見地；且認社會現象的質的特性，不是個人的屬性，而要在社會的全體中發見出來的。可是要「反駁」史的唯物論底切實階級的欲求，又使他們回復到爲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的個人方向。將社會視爲如個人的總體，而且把個人的關係，還原到當作第一次社會形成看的心理結合。

以上，是十九世紀初年以來布爾喬亞社會學之理論發展的根本特質。在帝國主義時代，布爾喬亞社會學也非發生新的變動不可。這變動的歸趨，使社會科會和自然科學之原則的對立傾向，越發擴大，拋棄歷史的合法則性，而想把它從英雄之「創造的」意志來說明；完全否定進化的思想，開始人種論的說教。可是這個人種論的使命，一方面是爲布爾喬亞「祖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奠定基礎；他方面則爲起因於人口各層的人種差別，或人種劣勢的，此種論調的社會之社會分化的必然性，奠定基石。

史的唯物論，是在對以上一切布爾喬亞社會學說的鬥爭裏，尤其特別重要的是和這些學說（布爾喬亞的）以某種的形式與程度散佈於勞動階級中的嘗試底鬥爭中，發展

出來的。蔽上史的唯物論的外套，或僭稱比史的唯物論的更發展的這些應有盡有的修正主義的和社會民主主義的社會歷史學說（第二國際「理論家」們的史的唯物論，托羅斯基的史的觀念論和主意主義；布格達諾夫及其他的馬哈主義的社會學；史的唯物論的少數派觀念論的修正主義和機械的修正主義等等）實際上是在勞動階級內流行的布爾喬亞社會學學說之特殊反映，而且到現在還是一樣。伊里奇和史太林，既粉碎了這一切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潮流，又使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得到更高級的發展和深化。

## 二 和客觀主義的鬥爭

伊里奇和史太林在與所有反馬克思主義潮流向偏向的鬪爭裏，常常，強調同時為最高度客觀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階級性，及其黨派性。「嚴正的黨派性，是高度發達的階級鬪爭底同伴者，反過來說，為着公然廣泛的階級鬪爭，那就要嚴正的黨派性的發展。」伊里奇再三地指摘過：我們在任意的道德的、宗教的、政治的、社會的言辭和聲明及約束的背後，應該暴露這各個的階級利害。「所謂從馬克思主義的來觀察，就是從階級鬪爭來觀察的。」伊里奇從其活動的最初一日起，就從同時為客觀性的最高形式底普羅列塔利亞

黨派性的正確理解出發，無論對客觀主義或主觀主義都作過徹底的鬭爭。

斯特魯維的客觀主義的特徵，首先是極端的抽象性，「學究的」態度；是企圖超越「所有特定的國家、特定的歷史時期和特定的階級」的希望。可是在實際上，斯特魯維的客觀主義——伊里奇指摘說——却完全帶着布爾喬亞的性質。客觀主義者說道：「難於克服的歷史的傾向，」並且「證明一定的事實系列的必然性，常常迷入於這些事實之辯護論的立場，」反之；唯物論者則暴露階級的矛盾，由此而決定自己的見地。唯物論者不只指出過程的必然性，並且闡明由怎樣的階級規定這個必然性呢！「唯物論者們是比客觀主義者更加徹底的；它是更深刻地，更完全地貫通了自己的客觀主義。」「假定唯物論是含有黨派性的話，則每當評價一事件時，就要以站在特定社會集團的見地為義務。」

### 三 和主觀主義的鬥爭

客觀主義者的極端的抽象性，實在是表示對現實性之消極的觀照的態度；表示對事件評價之觀念論的態度。蓋因客觀主義者，不是從具體的現實性的具體研究開始，而是從先天的判斷的「圖式」從「一般的抽象命題」出發，作「一般的」論斷的原故。這種

「狹隘的客觀主義」不是從階級的見地來考察歷史過程<sup>二</sup>一般，它在斯特魯維的場合，是伴着馬克思國家學說的偽造，國家是「秩序的組織」的主張，同時也伴着歷史的抽象的一般法則的構成等等。伊里奇對這些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作過系統的鬭爭。他還在一八九四年，對人民派的社會學說和他們的「主觀的方法」，「在歷史中的個人」的任務底主觀觀念論的學說，加以破壞的批判。和人民派之所以分離的最大原因——伊里奇這樣寫着——恐怕是當研究社會經濟的過程時，「人民派通常拿出了怎麼的道德的結論」的這一點上。

人民派臨到以歷史的事實為特徵的時候，不是從具體的現實性的具體研究開始，而是從道德規範和當為的見地，即是接近主觀主義的見地。俄國主觀主義者的方法——伊里奇這樣指摘——是很相像蒲魯東的方法的，即是欲把商品經濟依從自己的正義的理<sup>三</sup>想來改革。人民派把他們自己的要求，依照所謂「純粹正義」的抽象原理為基礎，而不須具有一定利害之實在的必要。

人民派的，以後是社會革命黨的，其一切政治方針和戰術，都是建築在這種觀念論的社會學上面的。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是和馬克思主義之最壞的敵人的人民主義的鬭爭中，

以粉碎他們的思想命題和政治鬭爭的手段及方法（和大衆黨組織不相容底個人的恐怖政策）爲基礎，而使自己成長和堅固的。

#### 四 和少數派修正主義的鬥爭

伊里奇在和少數派，特別是和普列哈諾夫的鬭爭中，他使客觀主義的批判發展和深化下去。他不絕的指摘少數派和布列哈諾夫對各個歷史事件評價之抽象的中立態度。

伊里奇當批判普列哈諾夫的綱領草案時，還舉出他的四個根本缺陷。（一）許多的定式之極端的抽象性，（二）特別是俄國資本主義問題的輕視和曖昧，（三）普羅列塔利亞和小生產者的關係之片面的不當的敘述，（四）不絕的企圖在綱領中給與過程之說明的傾向。

在和普列哈諾夫及少數派之後的鬭爭中，伊里奇也不絕的說出這種抽象的形式主義，與指摘其各種的側面。在「一步前進；二步退却」的小冊子裏也曾舉出普列哈諾夫的抽象性說：「普列哈諾夫最後只有滑稽地苦悶着自己的軀殼，才能夠擺脫得出來，這一切滑稽的可遺憾的誤解的泉源，是由於他破棄了應該在一切的具體性中檢討具體的問

題底辯證法的根本命題。」在「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第二版的序文中，他也舉出以普列哈諾夫爲首的少數派的性格的特徵，指出他們的根本缺陷是將具體問題的解答，求之於革命根本性質之一般的真理的單純理論的發展，而不是求之於各階級的地位和利害底具體的分析中。這個抽象的態度，伊里奇把它看作完全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平坦化；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嘲笑。少數派的這個抽象的態度，是表示着拒絕馬克思主義階級鬭爭的理論。故此伊里奇又把「少數派的馬克思主義，看做是用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尺度所裁剪出來的馬克思主義。」「若果你們不指示出怎樣的階級利害；在一定的時代中佔優勢的怎樣的利害，是規定各種的政黨和其政策的本質的，那麼你們在事實上並沒有應用到馬克思主義，你們在事實上就是放棄階級鬭爭的理論。」

少數派的抽象性，是表示馬克思主義階級鬭爭論的否定，它結局會回到對現實性之觀照的宿命論的態度。伊里奇曾講及俄國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三回大會和少數派會議的決議，如次寫着——「一方面的決議是表現積極鬭爭的心理；他方面是表現着消極的眼界的心理。一面是貫徹着生的行動的呼聲；他方面則始終於死板的議論。」「新火花派敘述思想的方法，會使人想到馬克思主義拒絕不知道辯證法觀念的舊唯物論。」「新火花

派雖能夠重新的記述，說明在他們眼前所發生的鬭爭，但在這鬭爭期間，他們是絕對不能給與正確的口號的。」創造變革之物質的條件，站在進步階級先頭的政黨，由於忽視在歷史上應盡的，而且又非盡不可的行動指導底傾向的任務，他們減低了唯物史觀的價值。」

在『少數派的危機』的論文（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會這樣說：少數派把「受動性」——這是布爾喬亞知識階級的本質——來說教；用屈服於反動之前的教授的「客觀主義」來代替「戰鬪的唯物論。」伊里奇一方面使少數派的客觀主義的批判發展；他方面指摘它向觀念論的移行。例如：「在應該怎樣寫革命」的論文中，曾說着：像普列哈諾夫和少數派所處理的那樣，「只停止在『責任』內閣和『無責任』內閣，以及議會專制政治等等的抽象的法律的對立上，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所完全不能容許的。」「這是自由主義觀念論的判斷；不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唯物論的判斷。」又在「政治的危機和機會主義戰術的崩壞」的論文中（一九〇六年九月三日），指摘少數派對政權獲得的問題，完全是站在「小市民的觀念論的」見地；而不是站在「普羅列塔利亞底唯物論的見地上。」

伊里奇和俄國的少數派的鬭爭中，同時對於國際的修正主義、中央派及盧森堡主義

等也行過系統的鬭爭。他舉出修正主義之社會的歷史見解變性性格特徵，是馬克思主義的真實基礎的否定，即是階級鬭爭學說的否定；並說他們用階級連帶的觀念來代替階級鬭爭的理論。從修正主義的這種性格的特徵看來：修正主義者們就是否定了社會主義能夠以科學的為基礎的可能性；使社會民主黨，變成以民主主義的經濟改革，來完成社會改造底政黨了。伊里奇指摘過修正主義否定階級鬭爭之觀念論的性質。在一九〇六年，伊里奇曾這樣寫過：從馬克思主義的見地看來，「歷史之真正的起動力是實踐底階級鬭爭；改革只是這鬭爭的副次的結果。」「要是依照布爾喬亞哲學者們看來——伊里奇繼續說着——就進步的起動力，是覺悟各種制度的「不完全」的，社會中一切分子的連帶性。前者的學說是唯物論的；後者是觀念論的。前者是革命的；後者是改良的。」機會主義者的根本缺陷是這樣：他們「用『連帶的』『社會的』進步和小布爾喬亞的理論，代替了事實上為歷史唯一實在的起動力底階級鬭爭的社會主義的理論。」

伊里奇和史太林，對托羅斯基的社會的歷史見解，並他的政治和實踐作了長期間的鬭爭，這也是值得注意的。為少數派一亞種的托羅斯基主義底社會學見解的性格的特徵，是主觀主義，觀念論，主意說；是不能從具體的現實的，階級勢力的客觀交互關係的嚴正估



計出發，而且也不欲這樣；它是用理論的「飛躍」來替代實際的「飛躍」；是忽視了在現實底運動中的大眾的任務的。

## 五 和普列哈諾夫的論爭

普列哈諾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是在史的唯物論中的地位，是非特別敘述一下不可的。普列哈諾夫嚴守史的唯物論的立場；從其所有一切的攻擊，從其敵人和曲解者中來擁護它。然而作為哲學科學看的唯物辯證法的某種過少評價和無理解，由它自身內在的理論所結合着，他的少數派的哲學基礎的，歪曲辯證法唯物論的幾多偏向，都不得不影響到他對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的理解。普列哈諾夫有許多背離史的唯物論本質的偏向。他的唯物論底特徵，是某種的抽象性和觀照性；是缺乏作為史的唯物論根本命題底社會經濟構成態的。普列哈諾夫從這個抽象的態度發生出了他對各種社會的事件評價之形式論理的圖式的態度；特別是產生出了他對俄國革命的起動力和其展望的少數派的評價。他不能考察在社會發展中之具體的階段；同時也沒有充分正確理解在社會發展中之內在的合法則性的任務。他把生產力的發展，究極的以地理環境影響來說明。作為人類

先史（除原始狀態外）運動法則底階級鬭爭的任務和意義的忽視；史的唯物論的階級內容的削除，是和他這個「地理學的偏向」有着不可分的聯繫的。他的根本謬誤都集中在表現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中的有名的五段式裏面了。下層基礎對上層構造的關係，他用如次的圖式表示着：（一）生產力，（二）爲生產力所制約的經濟關係，（三）成長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社會政治的諸制度，（四）一部分直接由經濟所規定，他部分由成長於經濟基礎上的社會政治的諸制度之全體所規定的社會人類的心理，（五）反映這心理的屬性底各種的意識形態。這五段式的根本缺陷的歸趨，是把史的唯物論的根本範疇互相切離開來，沒有理解當作生產力發展形式看的生產關係的能動的任務；蔑視在社會發展的階級及階級鬭爭的任務；抹煞當作經濟集中表現着的政治（國家）的任務，最後是沒有理解在社會發展中，意識形態的能動的作用。

## 六 伊里奇階段底史的唯物論的發展

在對普列哈諾夫的少數派主義的鬭爭中，伊里奇不斷的指摘違反徹底的史的唯物論之根本的偏向。他從馬克思及恩格斯所指出的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出發，使史的唯

物論發展到更高級的階段。由伊里奇所發展的史的唯物論，是向如次所述的主要方向進行的。

把史的唯物論，從辯證法切離開來的修正主義者，伊里奇和他們的鬭爭中是特別執拗地強調這兩者的密切不可分的聯結和統一。伊里奇指示了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唯物史觀底內在聯結的所在；以及在社會現象之上，應該怎樣貫通唯物論。跟這關聯的，伊里奇才的定式化了史的唯物論的根本命題，即是：一方面是從一切布爾喬亞社會學說區別出史的唯物論的界限；他方面是當作理解史的唯物論一切範疇的順列和內在相互依存關係底出發點看的，社會的意識和社會的存在之關係怎樣的問題。伊里奇和史的唯物論的鬭爭中，一方面發展馬克思關於史的唯物論的主要問題的學說；他方面指示出社會存在的物質性和客觀性是存在於那一點，同時又指示出離開社會意識底社會存在的獨立性的所在。

伊里奇把社會的存在和社會的意識之統一的問題，適切深刻地提出，並且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後，就越加發展和深化史的唯物論的根本概念和構成態的學說。那麼伊里奇理論的功績，第一是具體的研究了各個構成態的歷史，其特殊的合法則性，在各國和各種歷

史時代中的它的特性；第二是基於經驗底材料的研究，來創造構成態之一般的理論的。關於經驗之材料的研究及各國中的各個構成態發展的具體進行的研究，伊里奇是首先注重於各種國家的不同型的資本主義，尤其側重於俄國資本主義發達的合法則性的研究；研究以農奴制度為條件的俄國資本主義發達的特殊道程，同時又研究俄國專制政治的社會的本質，及俄國封建制度發達的道程和特殊性。伊里奇發見馬克思以後資本主義發達的合法則性，闡明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階段；定式化了資本主義的不均等發展的法則，由此，奠基了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可能性，伊里奇在過渡期的研究中也費了同樣的注意來研究各種制度間的鬥爭；各種階級的交互關係，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的道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分析；在過渡期經濟和政治的交互關係；文化革命的問題等。

伊里奇關於各種構成態的分析，是不止僅停留在資本主義構成態的合法則性和過渡期的問題的研究的。他和這根本任務同時，也闡明了原始共產體和奴隸所有者的構成態，特別是封建構成態發展的合法則性和道程。他基於豐富的經驗材料，特別是基於資本主義構成態和過渡期的研究，完成了構成態之一般的理論；給與構成態的古典的規定，及

完成了關於同構成態的發展階段（例如原始共產主義的發展階段；從十七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俄國專制政治的進化；資本主義發達階段等）的學說。他從馬克思的各個學說出發，而創造了關於制度的理論；關於其交互關係和鬥爭的理論。他發展馬克思對下層基礎和上層構造的學說，而給以各種的構成態，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構成態和過渡期中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分析；同時又闡明經濟發展中之上部構造形態之作用和意義。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強調了在原則上和從來的構成態是不同的，過渡期的經濟和政治的交互關係；及以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和意義為基礎的意識性和自然生長性的學說。伊里奇又因研究各個構成態發展的合法則性，而使馬克思之當作人類先史（除原始共同體外）的發展法則看的階級鬥爭理論發展。他在「偉大的建議」的論文中，給以正確而又深刻的階級的定義，解明了階級鬥爭的形態，各種階級的交互關係，和階級鬥爭的實踐。

在討論史的唯物論的諸問題中的伊里奇的本質特徵，就是對史的唯物論的一切根本問題，都把史的唯物論作為一個黨派科學來處理。他是在兩條戰線中鬥爭了的。戰鬥的黨派性和兩條戰線的鬥爭，就是伊里奇在史的唯物論發展中之發展的鮮明特徵。史的唯物論，要當作普羅列塔利亞實踐鬥爭的理論基礎；當作離開人類先史的直接飛躍和社會

主義建設爲基礎的理論，才能夠使其發展起來的。因此，伊里奇使史的唯物論沿着構成態之理論的更高級的完成其合法則的研究，以及一個構成態交代給另個構成態之研究的方向而發展了。

## 七 史太林階段底史的唯物論的發展

史的唯物論由史太林使其更高的發展，也是與此取同一方向進行的。和伊里奇的場合相同，在史太林的著作中，史的唯物論首先是作爲以帝國主義凋落及社會主義建設爲基礎的理論而發展的。伊里奇以後，史太林對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發達的不均等性，各階級勢力關係及在階級鬥爭形態的本質變動等，都給以深刻的分析。他使伊里奇關於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的學說，得到更高級的發展且深化（資本主義發達的不均等性的法則；鎖的切斷；社會主義建設底內的及外的可能性和條件的問題。）他基此而使史的唯物論的根本範疇發展，同時對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各種機會主義潮流和反馬克思主義潮流，行過誓不兩立的鬥爭。他展開了社會主義的根本的合法則性之天才的立論，完成了其所有一切的根本命題，使馬克思、恩格斯和伊里奇的這些命題和見解發展了。即

是社會主義構成態的形成問題；新經濟政策的辯證法；諸種制度的發展；在新經濟政策的各個階段中的各種制度的交互關係；「誰對誰」的問題的解決；俄國社會主義建設之今後的途徑等等。他基於國民經濟的產業化和重建的問題，以及勞勸生產性的發展條件（六個條件，在重建期技術的任務和意義；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清算當作階級看的取農；農業發展之今後的途徑等等）的研究，而使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馬——伊主義學說更爲豐富，同時創造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生產樣式底完備的理論。和這個相關聯，史太林又深化了馬——伊主義的階級鬥爭論，解明了在過渡期各個階段上的階級鬥爭的各種形態，闡明階級絕滅和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途徑。

普羅列塔利亞的獨裁；它的三個側面；它的強化；它在蘇聯的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中的任務和意義；普羅列塔利亞的同盟者；民族問題；文化革命；理論鬥爭的意義；在人們的經濟和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滓的清算，關於這等等的馬——伊主義的學說，史太林一面使它發展；他方面又使下層基礎和上部構造的馬——伊主義學說越加發展且深化。發表在「亞華爾·茨荷烏雷巴」和「支維尼·茨荷烏雷巴」雜誌上的一九〇六年的初期論文裏，史太林就已經發展了關於經濟基礎和上部構造；形式和內容；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

辯證法底馬——伊主義理論了。「首先是外的條件起變化；首先是物質起變化。次之，跟它照應着的意識和其他精神現象也起變化——觀念這方面的發達，是遲於物質條件的發達。若果把物質的這面、外的條件、存在等等命名為內容；則觀念、意識等等，必須命名為形式。於是一定的唯物論命題，就會出現說：在發展過程中，內容是先於形式；形式後於內容。同樣，對於社會生活也可以這樣適用。無論那裏，物質的發展都是先於觀念的發展；形式都是後於內容。資本主義既已存在，就在激烈的階級鬥爭過程的時候，科學的社會主義還未出現其鱗片，而且在生產過程既已經有着社會的性質的時候，而甚麼地方都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想發生。

故此馬克思說——「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毋寧說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見馬克斯「經濟學批判。」）這樣，依照馬克思的意見，則經濟的發展，是物質生活的基礎，是內容；而法律上、政治上、及宗教上、哲學上的發展，就是這內容的「意識形態」是上部構造。故馬克思說——「跟着經濟基礎的變化；其上部構造遲早也要起變化。」

是的，在生活上，首先也是外的物質條件起變化；次之，人們的思惟，他們的世界觀才起



變化內容的發展是先於形式的發生及發展。不消說，這正如修·格所云（見「洛布」第一號「一元論的批判」）若依照馬克思的意見，就決不能這樣說：『沒有形式的內容是可能的。』是這樣的：沒有形式的內容雖是不可能，然而主要的却是因為形式後於內容，故各個形式絕不能完全照應它的內容，這樣，新的內容一時「爲不得已」暫裝在舊的形式中，這就引起了形式和內容的衝突。例如：今日生產的社會性質，是和生產物佔有的私的性質不一致，正以這個作地盤，而發生着今日的社會的「衝突」。

史太林暴露了托羅斯基底永久革命論的少數派的本質；暴露了考茨基對帝國主義下的資本主義發達的不均等性，和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之可能性的否定。在對反對派集團的鬥爭中，史太林把一國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性，給以理論的基礎，且使這學說全面的發展了。他批判右翼機會主義之理論和戰術，而這樣地指出，即是：右翼機會主義者們，在形式上雖承認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但由於否定社會主義建設之正確的途徑和手段（對於重工業及機械製造的全面的發達；農業集團化；資本主義要素底前線攻擊等等。）那麼實際上是托羅斯基主義的同謀者，否定一國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性的。史太林把均衡論；階級鬥爭消滅的右翼機會主義的理論；向富農和涅普曼（俄國新經濟政策下發生

的以利潤爲目的的個人企業家和投機商人——中譯者）的社會主義的轉化；布林對伊里奇的新經濟政策及協同組合計劃的無理解；布林對國家問題之半無政府主義的謬誤等，都加以破壞的批判。同時又暴露了少數派的觀念論所固有的理論與實踐的分離；哲學和政治及社會主義建設的緊急任務底分離；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中之伊里奇階段的否定；普列哈諾夫之錯誤底更深化等。對戰鬥的黨派性以及對一切種類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史太林之理論的及政治活動全體的特色。